

以铜为鉴 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鉴 可以明得失

2022年 第1期

总第12期（半年刊）

编辑部

主 编 刘怀广
副 主 编 张国庆 卢华德
编 委 张良超 陈 亮
李 影 赵颖莹
执行主编 薛振国
责任编辑 齐雪峰 王艳梅
金正东

※※※※※※※※※※※※※※※※

主办单位：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
党史工作办公室

编辑出版：《丰台史志》编辑部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文体路2号

邮政编码：100071

联系电话：83656172

传 真：83656076

电子邮箱：dsb6006@163.com

网 址：http://ftds.bjft.gov.cn

出版日期：2022年6月15日

※※※※※※※※※※※※※※※※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丰台史志

目 录

理 论

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2)

党史学习

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曲青山 (8)

专题资料

朱副主席来厂 (15)
支援首都建设 (17)

丰台人文

文化强区 挥动提速城市建设的生花妙笔 张 静 (20)

抗战中的丰台

★民族危机笼罩下的华北 ★卢沟桥畔浴血战
★同仇敌忾赴国难 (23)

丰台史话

南中轴的历史变迁（连载二） (26)

回眸丰台60载

丰台区1962年1—6月大事记 (62)

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于党史工作而言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这次全会是在我们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决议》回顾党走过的百年奋斗历程，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着重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明确要求，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系统性地总结了党和国家的工作，深刻阐述了坚定历史自信、坚持党的政治建设、坚持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号召全党同志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全会取得的重大成果、作出的重大部署，对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在新时代更好开

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

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1945 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增强了全党团结，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条件，有力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发展。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纠正了“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建党到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前两个历史决议基本都解决了，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讲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以推动全党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局面，需要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认清历史方位、把握历史规律。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

因此，党中央决定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郑重的历史性、战略性决策，充分体现党牢记初心使命、永葆生机活力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党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充分体现党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注重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全会通过的《决议》和党作出的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必将对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深刻领会《决议》的重大创新

《决议》充分吸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重要论述内容，充分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自身历史认识的新发展，密切关注党史学习教育新进展，注重运用党史基本著作成果和党史界学术研究成熟成果，形成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表述。这些新论断新表述，是学习全会精神应当重点把握的地方。

第一，明确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党的历史的第四个时期，并作为《决议》的重点内容予以阐述。

《决议》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对党的百年奋斗和辉煌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从各个历史时期所占的篇幅来看，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用笔墨最多、占篇幅最大，超过《决议》的二分之一。如果说第一部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第二部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第三部分“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的“大写意”，第四部分则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的“工笔画”。

《决议》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主要考虑是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历史，前两个历史决议已经做过系统总结，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对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成就和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30周年时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时，党中央都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总结。因此，《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并对其进行认真及时梳理和总结。这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第二，鲜明提炼了“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重大意义，提出“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论断。

“两个确立”是一个重大政治论断。学习领会《决议》精神，首先需要理解和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是在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历史方位下确立的。《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就是新时代五个方面的

内涵和特征，这五个方面也确定了我们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标定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

正是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人民情怀、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成为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顺势而成。其中，“第一个确立”是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确立的，“第二个确立”是在党的十九大上确立的，这“两个确立”都在党的十九大上写入党章。“两个确立”是总结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得出的必然结论，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强领导核心的确立总是与科学思想的指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产生了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坚强领导核心领导了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孕育和催生了党的创新理论，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了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坚强的核心、先进的思想与非凡的事业彼此辉映，在互动互变互促中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把“两个确立”写进《决议》，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奋斗的结晶，也是历史经验的启迪、历史规律的昭示，充分彰显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

第三，进一步提炼和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关内容。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这“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渊源问题的认识深化和提高，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一个时代课题基础上，拓展为三个时代课题，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八个明确”拓展为“十个明确”。增加了第七、第十两个“明确”：“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

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同时，第一个“明确”增加了“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表述；第二个“明确”增加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第三个“明确”增加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表述；第九个“明确”增加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表述。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提出了“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等新表述。这些重大创新，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再概括、再提炼，是我们党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第四，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从十三个方面作出新的概括。

这十三个方面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决议》对每个方面的阐述，大体按照历史脉络、时代背景、实践过程、时间顺序、逻辑关系、具体内容层层递进、逐步展开。叙述的内容是在各个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进行了什么样的思考，提出了什么样的方略，采取了什么样的举措，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怎么干的、怎么干成的，最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这是对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成就和经验的全面总结、全面展示。在此基础上，《决议》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成就，这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五，系统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

《决议》从五个方面首次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这就是：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的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五条概括，既立足中华大地，又放眼人类未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贯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决议》首次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十条宝贵经验，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十个坚持”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

深刻认识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重要要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学习总结党史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目的都是号召全党同志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决议》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党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用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励人，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

关于如何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了四点。一是坚定历史自信，自觉坚守理想信念。《决议》充分显示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信，向党内外、国内外展示了一个百年大党的清醒和成熟。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都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就要从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二是坚持党的政治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前途和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全党要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步调一致向前进。三是坚定担当责任，不断增强进行伟大斗争的意志和本领。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我们党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我们必须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发扬斗争精

神，把握斗争方向，把握斗争主动权，坚定斗争意志，掌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四是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2022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点强调和深刻阐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重视战略策略问题、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等五个问题，强调要深入研读和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这对于全党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 曲青山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初心要回答的问题是“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使命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了谁”，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这两个问题涉及的都是我们党立党执政的根本性问题。笔者从三个维度谈谈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认识和体会。

一、从党的旗帜看初心和使命

党的旗帜是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的行动指南。我们党的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

产党指导思想的“流”。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运用发展的“流”，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道统”。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论述，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第一个维度。

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论述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呢？《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策略原则，提出了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和最

终目标。

列宁是怎样论述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呢？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他强调，工人阶级不仅要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还要通过建立政权来为人民谋利益。1921年4月，他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作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时强调：

“只要能够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我们不惜让外国资本家拿走2000%的利润——而改善工农生活状况这一点则是无论如何应当实现的”。他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后，一定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定要为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为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继续奋斗。

毛泽东同志是怎样论述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呢？毛泽东同志用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语言，高度概括提炼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1941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时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1944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警备团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从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被写入党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还特别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他不断提醒全党不要忘记和违背党的性质宗旨。

邓小平同志是怎样论述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

“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贡献。”1985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

“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同志提出，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他还强调，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江泽民同志是怎样论述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呢？进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总结我们党始终获得人民拥护的历史经验和根本原因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说：“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的要求，就是党执政是为了人民。

胡锦涛同志是怎样论述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呢？新阶段，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于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他强调，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习近平同志又是怎样论述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2012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提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论断。这实际上是用一种通俗的语言，对党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进行了具体形象生动的表述和概括。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01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鲜明地提出了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命题。他特别强调：“不

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2019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用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实践历练中增长经验智慧，在经风雨、见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2021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牢记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贯穿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我们党能够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发展壮大起来，能够在千难万险中一次次浴火重生，

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

由此可见，从党的旗帜看，从党的指导思想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也是承前启后、与时俱进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思想理论优势，再加上它的先进的阶级基础、广大的群众基础，它就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始终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敢于做、能够做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做不了、做不到的事，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干成了大事，在世界人类文明进步历史上建立了伟业。

二、从党的历史看初心和使命

党的历史是对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的真实记录。2021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四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四大里程碑。党的历史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第二个维度。

第一大历史性事件和第一大里程碑：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的必然产物。“十月革命一声

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五四运动中，以上海工人自发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为标志，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另一个重要条件。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党的创建的历史时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第二大历史性事件和第二大里程碑：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的必然结果。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始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这是我们党所肩负的第二大历史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

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三大历史性事件和第三大里程碑：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的必然抉择。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对我国发展落后的反思，是对世界发展潮流的反思。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第四大历史性事件和第四大里程碑：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的必然趋势。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历史表明，我们党的百年奋斗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就是从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看党的初心和使命。

三、从党的擘画看初心和使命

党的擘画是对未来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蓝图的描绘。中国共产党有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也有现阶段理想和不同阶段奋斗目标。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

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理想和现阶段奋斗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擘画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第三个维度。

我们党对发展蓝图的擘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以及“小康社会”的构想。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小康社会的构想，提出了到二十世纪末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的目标。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设想，规划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第二步到第三步之间，又规划了一个“新三步走”发展战略。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目标。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成两个阶段进行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的实现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实现了这个奋斗目标，也就是完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完成了我们党肩负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

第二大历史任务。

新时代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它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我们面临着各种严峻风险的挑战。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信仰、信念、信心至关重要。2018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我们实现党的十九大宏伟蓝图的根本思想保证和政治保障。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讲到二十四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时，用了《庄子》里的两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党的一大召开时，参加一大的代表只有十几人，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代表中年龄最大的四十五岁，最小的十九岁，平均年龄二十八岁。建党时，我们党是多么“简”啊！今天，我们党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党，有九千五百多万名党员、四百八十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在十四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

政。新中国成立也已经七十多年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我们党又是多么“巨”啊！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2016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同志在带领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去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2021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发出伟大号召，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党就能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凝聚起磅礴的力量，我们党就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朱副主席来厂

(一)

红十月战斗的第十七天，蓝天上飘着朵朵红霞，阳光格外明亮。全厂的职工，精神抖擞，饱含激情，战斗在两个战场上。

在炼钢战场上是：

百座土炉平地起，
红红钢水日夜流，
三千大军齐奋战，
不夺钢材誓不休。

在生产战场上是：

技术革命开红花，
缺料也能想办法，
土洋结合造机器，
跃进路上如跑马。

就在这个火候上，一个使人兴奋的好消息传遍了全厂。人们在隆隆的机器吼叫声中，互相传告者：“我们敬爱的朱副主席来了。”

这消息给干劲十足的职工马上又增加了万倍力量，像东风吹起万顷巨浪，使全厂的生产 and 夺钢高潮，达到了沸腾的顶点，于是：

马达的轰鸣更加激昂动听，
工人操作起机器轻快如风，
生产指标长起了红色翅膀，
炼钢炉前舞动起钢铁巨龙。

工人的心，马达的轰鸣，新的生产纪录，钢铁巨龙……一切都在欢呼！它欢呼朱副主席的到来。

朱副主席来了。人群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站在我身旁的张老头，朝着朱副主席走来的方向跑去。朱副主席似乎早已理解到这个白发苍苍、骤然年轻了许多的老工人的心情，亲切地伸出手去向他握手。

张老头已经是年近六十岁的人了，一辈子受了近五十年的苦，在旧社会，挨过打，失过业，甚至穷得连老婆也养不起。解放



1958年，朱副主席来厂视察。

后不仅使他翻了身，还连续三次被评上先进生产者，现在他能和领袖握手，又怎能不愉快和激动呢！

(二)

朱副主席关心职工和每项平凡的劳动。在厂里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副主席一刻也没有休息，走遍了每个车间，反复地了解产品性能，然后作了宝贵的指示。

在“先张式预应力梁”工地上，副主席一手抚摸着堵头上的钢丝，一边微笑着听总工程师张志良同志的汇报。

“‘先张式预应力梁’是工厂的新产品之一，能够比一孔钢梁节省近百分之七十的钢材，比起一孔‘后张式预应力梁’来，还能再节约钢材百分之二十三，而且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呢！”张志良同志汇报说。

“我们的各项事业大有发展前途，只要思想解放了，许多困难都能克服。”副主席简短地指示了几句，看了看“预应力梁”的庞大身躯，接着问：“一孔梁有多重，成本是多少？”

“重一百四十四吨，一孔成本是二万零六十五元。”车间主任张玉镇同志答道。

副主席微笑着说：“可不可以使梁再轻一点？使成本再低一点？”敬爱的领袖对我们的工作是多么关心啊！指示是多么细致周到啊！

接着，副主席来到高大的制管机前。制管机上的毛布，正在有节奏地转动着，它把石棉和水泥的合成液体，均衡地送到成形轴上。不到一分钟功夫，一根石棉管就诞生了。副主席仔细地看了石棉管的生产过程，向站在身旁的张志良同志问：

“石棉管的性能怎么样？主要用途是什么？”

“石棉管具有强度高、重量轻、价格低廉、耐蚀、绝缘、能代替钢铁管材在多方面使用等优点。如果按生产设计能力计算，一年就可以节约五万二千吨钢材。”张志良一口气回答了朱副主席的问话。显然，他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和喜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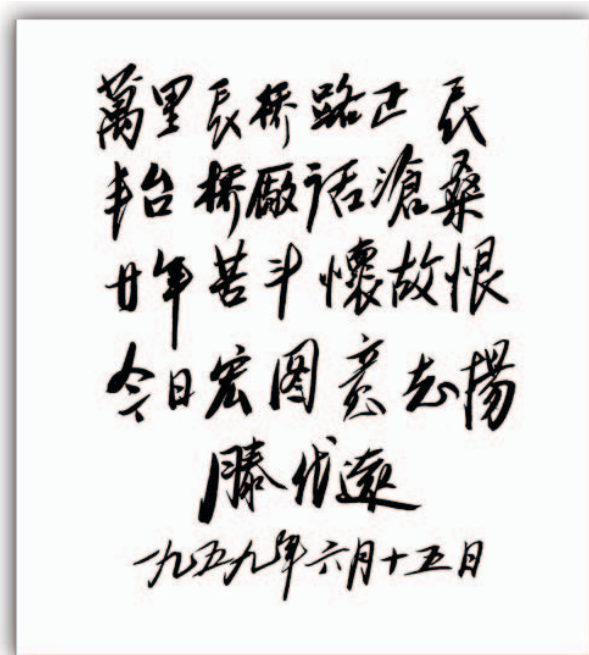
朱副主席点了点头，微笑着说：“这种产品应该多多生产！”

(三)

副主席来到一吨转炉旁，这台转炉昨夜才正式投入生产，立下了首次战功。老工人魏茂桐等正在进行修炉工作，朱副主席走上前去，亲切地拍着魏茂桐同志的肩膀问：“身体还好吗？”

“很好。”魏茂桐同志红着脸回答。

“应该注意身体。”朱副主席再一次亲



(下转第 19 页)

支援首都建设

我们是首都的工人，都愿意为首都的建设多出一份力，把我们的首都建筑得更宏伟更美丽。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创造性地利用电杆空心的特点，制成新产品，支持了天安门的改建工程。这种产品在解放初期只有我们厂制造，但现在已在全国推广了。我们制造了预应力梁，支持了丰台车站驼峰货场的修建，我们制造了首都剧场的屋架、北京饭店的屋架基桩、永定河引水工程的闸门……，和全市工人兄弟一样，在支持首都的建设上，我们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礼堂，可供几千人聚会。当人们走进会场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楼上的看台有独特之处。像这样三十公尺左右宽的看台，下面没有支柱，那时在首都还没有见到过。人们也许会有些担心，但是不要紧，它是由一个一人半高的钢梁支撑着。这个钢梁约有二千袋白面的重量，在这个大梁上又承托着不少放射性小梁，这些大小梁便是我们厂工人制造的。要把这么重的梁从平地上提高到六、七公尺高的半空，那是多么的困难。起重机还吊不了那么重，而且起重机也根本无法开进当时政协礼堂的工地。那怎么办呢？困难难不倒咱们厂的起重工人们，你信不信？他们仅仅用了二根木柱，在几小时内，

便把这样举重的钢梁装上去了。

（二）

一九五三年时，我们还是一个小厂子。当时钢结构生产能力很低，技术工人也很少。一天，铁道部派来了两位工程师，传达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改建怀仁堂。要我们担任钢屋架制造及安装工作。时间短促，大概只能有一个月左右。并且还要和现场土建工程配合进行。听说要改建国家领导人集会的怀仁堂，并且要在这里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人们沸腾了。在现场会上，大伙纷纷提出了保证。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制造钢屋架，本来应该画施工图，但时间来不及了，于是，就大胆采用了就地放样不再画图，工程技术人员深入现场，就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一下子就节约了十多天时间。因材料规格和图纸不符，便采用代用材料。而为了给安装创造条件，便依照安装顺序来创造。这又大大地缩短了工作时间。

最困难的还是安装工作。因为怀仁堂原来很小，而且两侧都有房子，只两端可以通行。但地方也不大，连材料都放不下。安装时又不能碰坏一切东西和古迹，起重设备也用不上。不光这样，当时土建工程也正在进行，所以还不能妨碍他们的工作。怎么办？老师傅们开了群众会、诸葛亮会，

办法有了。料不能运，用人抬；上不去，搭架子。几天之内，搭了个满堂脚手架。几十吨材料，用人工一根根地抬上去，而且在几十丈高的高空中拼装。当时天下着毛毛细雨，路不好走，天气又闷热，汗流浹背。但是，大家一想到这是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啊！立刻力量百倍。拼配铆钉的工人们，接着上来了。他们有把烧红的铆钉从地下扔到十几丈高高空的技巧，但是为了防火，他们却把铆钉炉也抬到了高空来进行作业。一筐筐的煤，一个一个钉子，都从地下搬上去了。这样，原来计划二十天的安装任务，只用了十几天就完成了。

（三）

苏联展览馆，现在叫北京展览馆。它最大的标志，就是高入云端的五十余公尺的镏金铁塔。日光从表面镏金的塔身反射出来，灿烂耀眼。夜间，塔顶的五星放出红色光芒，庄严美丽。

我们在一九五四年接受了制造装配这个铁塔的光荣任务。铁塔是由苏联设计的，技术要求很高。当时我们的电焊技术还比较差，但在苏联专家的鼓舞下，我们勇敢地承担下来了。铁塔高四十余公尺，是用二十余节拼装起来的。当时展览馆整个工程要求在“五一”节前完工。拼装铁塔，从四月上旬开始。因为四周土建工程已经完成，所以铁塔是从室内一节节地由下往上拼装。拼一节从塔身内往上吊一节，越往上，外面就越看不见。要拼装得很直，是个困难工作。但是我们按照技术要求，仅仅用了十天功夫就完成了。

制造塔顶上的红五星更困难。听说原来打算在苏联订货，但由于时间紧急，赶

不上。那时，我们厂的工人们说话了：只要有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再困难我们也一定能制造出来。没有设备，我们用双手制造；没有经验，我们可以依靠群众。我们一定要让它在工人的节日——“五一”，从塔顶上放出灿烂的光芒。

好！行动开始了。车间主任、领工员和大家一起干起来了。没有机器，就用砂轮把几十根角钢一点一点磨出来了。

红五星在塔顶上看着很小，但它有一丈宽一千多斤重。原来计划把它从脚手架上，用八个人抬上去，估计一天能装好。但后来架子拆掉了，抬不上去。怎么办？当时已经是二十八日，里面还有一百四十多个电灯的安装工作。这个红五星如果不在二十九日这一天装好，那么“五一”就亮不起来。大家都为这个焦急地想办法。从塔里面吊，不行，太窄；用起重机，没有这样高这样长的机器。再重搭架子，不可能。这时，起重老工人们，凭着他们几十年的经验，又想出了高妙的办法。他们大胆地提出，在塔顶上立两根木杆，利用屋侧的提升架，中间拉上钢丝绳，用杂技团走绳索的办法，从空中把红五星拖上去。并且说：有半天的功夫便能完成任务。这办法刚提出来，好些人都怀疑，也有的人惊讶：这真叫奥妙啊！但领导上支持了这个建议。工作就在二十九日早晨开始了。嗨！不到中午的时候就安装成功了。

（四）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文化体育事业也飞跃地发展着。首都建筑一座大型的体育比赛馆。这个比赛馆的结构，是世界上少有的。五十六公尺宽，三十多公尺高，

中间没有柱子。这是怎样建筑起来的呢？

掌握设计的苏联专家一到中国后，便提出这个结构要我们制造，因为他在苏联时，就听说首都有个丰台桥梁工厂。

制造这样大的钢架，必须要求精确，不差分毫才能装上。当时碰到最大的困难是底座。底座由两个半圆形吻合而成，规定要用铸钢。铸钢设备没有，加工设备没有，怎么办？后来我们用钢板拼成，用手工代替了机械。

半个钢架就有六吨重、三十公尺长，架起来时又不能固定，所以安装时的安全工作是很重要的。当时正值春节，天气塞冷。每天早晨工人们登上三十多公尺高的架顶上，顶上一片霜，不小心就会滑下来。

(上接第16页)

切地嘱咐。

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办公楼前的花园里已经站满了等着欢送朱副主席的人群，其中有子弟小学的少先队员，有听到消息后从宿舍赶来的倒班工和退休老工人。人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讲述着一九五六年朱副主席来厂的情况。

朱副主席从办公楼门内走出来了，人群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大家都高喊着：“共产党万岁！”

朱副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微笑着从欢呼的人群中慢步走过。他老人家像知道群众心事似的，向大家招手，直到厂门口，才乘上汽车，向工人同志们告别。

(四)

朱副主席走后的第一个早晨，厂大门口出现了一排排的喜报。第一块报喜牌上，

而且经常有五、六级大风，很难立脚。

安装工作应该开始了，可是因为底座没有制好，不能按时开工。当时工地负责人非常着急，因为这个工程的完工日期不能延误。工人们进行了讨论，采取了措施。要在延期开工的情况下，仍然保证按期完工，并且争取提前。安装开始了，第一架安装又延误了两天。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工程如能提前一天，是有不小的意义的。大伙工作得更带劲了。有了第一架安装的经验，使工作熟练了，就一架比一架地缩短时间，结果比预计的进度还提前了三天哩！(范景宗、王新成、王丕均等谈 王忠义整理)

(本文摘自：《长桥万里——丰台桥梁工厂史》，北京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就有了用斗大的红字写着的：机配车间一吨转炉创一夜炼钢五吨的最高纪录。原来，当炼钢工人夜晚上班时，知道朱副主席来厂，并视察了炼钢炉的消息后，顿时干劲冲天，把原订二十日出钢的计划，提前了三天。

第二块报喜牌上写着丁梁车间职工的决心。他们写道：“我们一定遵循朱副主席的指示，力争降低成本，十月超过产值十万元。”

除了颜色鲜艳的报喜牌外，墙头上还贴满了笔迹未干的大字报。这是各车间、各工组以及个人的保证书和决心书。

在党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全厂的三千多名职工，誓做跃进的先锋。一个更大的跃进高潮掀起来了。(杨洪钧)

(本文摘自：《长桥万里——丰台桥梁工厂史》，北京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文化强区 挥动提速城市建设的生花妙笔

●张静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对于一个城市来说，经济强其骨，文化铸其魂。在文化传统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强的今天，城市建设不仅要有卓越的建筑、完善的设施、一流的硬件，还必须有自己的性格、品质和精神。丰台区位于北京市南部，是首都中心城区和首都核心功能主承载区。借力首都发展、实施文化强区，是丰台立足自身禀赋优势，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的必由之路，也是回应市委“妙笔生花看丰台”殷切希望的关键之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北京作为千年古都和当代中国首都，理应将文化作为城市发展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作为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之一。这无疑是向北京市及所属各区县，发出了加强文化建设、守护“城市之魂”的动员令。为此，丰台区委确定了书写“中轴永定承古韵，蓝脉绿廊绕今城”的新时代城市建设规划。通过南中轴（一轴）和永定河文化带（一带）统领文化空间结构，构建莲花池——金中都、南中轴——南苑、卢沟桥——宛平城——长辛店三大文化板块，打造丰台文化十景，加强文化特色资

源保护，推进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强化首都文脉标志。

丰台文化形式呈现广泛多元的特点，文化资源可谓得天独厚。从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维度，构建起文化兴区育人的多种可能范式，也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提供了“诗意栖居”的源头活水。

在时间的长河中追溯古都之魂

北京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位于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及右安门街道辖区的莲花池、金中都遗址公园、金中都水关遗址是北京建城、建都的重要见证，堪称北京的原乡所在。

3000多年前，依托莲花池水系，时人建造了燕都蓟城，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开源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提出“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莲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头”等论断，莲花池被誉为北京城的“摇篮”。今天，当人们漫步湖岸，近距离欣赏娇艳的荷花，感叹于北京的古韵悠长，于繁华中领略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800多年前，金海陵王迁都燕京，改名中都，开启了北京作为国都的纪元。这

种政治优势，极大促进了古代北京的发展——人口繁衍，商业繁荣，市场兴盛。忆昔中都风采，在金中都遗址公园、水关长城遗址，尚能窥其一斑。

丰台区自古还是京西南陆路交通的咽喉要地。清代从北京通往全国的八条御道中，有六条经过丰台地区，自广安门经卢沟桥至长辛店的西路石道被称为“九省御路”。永定河上的卢沟古渡口是南北往来的咽喉要道，当时的卢沟桥“喧喧行路人，日仄殊未已”，算得上繁华一时。

故乡载着乡愁，原乡埋藏根脉。客从何处来？在纷繁的时代，现代人都要面临这样的设问。而历史存在于历史的记述和历史遗迹中。一座城市，也要发掘源起之处，在对历史的审视中，自省自励，传承开新。以莲花池、金中都遗址公园、金中都水关遗址为核心，结合丽泽商务区、丽泽航站楼建设，丰台区坚持历史文化特色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正走出一条新故相推的文化强区之路。

为时代传承许党报国的精神基因

位于丰台西部的长辛店曾是进出北京西南的门户，随着铁路交通的兴起，20世纪初这里曾聚集大量产业工人。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到长辛店活动，还直接推动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了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最高峰。现在，长辛店二七纪念馆还保存着京汉铁路工人革命斗争的大量实物，传递着宝贵的革命斗争精神。

发生在卢沟桥的七七事变，将丰台

推到抗战救亡的历史前台。建于明代的宛平城，已有近400年的历史，与卢沟桥一起见证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见证了抗日军民的浴血奋战，至今城墙上还残留着当年日军炮击的弹痕。中国人素有家国情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以同仇敌忾，死而后已。宛平城、卢沟桥早已将这种家国情怀沉淀在了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就建在宛平城内，距离市中心15公里，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承载着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历史记忆。目前，卢沟桥—宛平城已经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国家重大活动纪念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下一步，这里还将建设卢沟桥国家文化公园区，塑造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地、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纪念地，形成丰台作为革命精神传承地的文化标识。

此外，中国最早的航空学校，开国大典升空的飞机，新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都发生在丰台，它们曾寄托着一代中国人的骄傲，至今仍闪耀着斑斓的爱国主义光芒和艰苦奋斗精神，为丰台乃至为中华民族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城南方案”

丰台自古水源丰沛，草木丰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历史上的丰台成为皇家贵族游玩狩猎的重要去处，也是百姓亲近自然、养花种菜的区域。称其为京南花苑，并不为过。

“泉甘土沃，养花最宜”，花乡居民

种养花卉的历史有 800 年之久。从辽金到明清，丰台花乡即为皇宫贵族、文人墨客的赏花休闲地。如今的花乡是“中国花木之乡”、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地，曾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等提供花艺设计，花乡花卉品牌走向了全世界。

北京市四环内最大的植物温室在丰台。占地四十多公顷的世界花卉大观园，是以展示农业、花卉科技为主的都市园林，它集观光、旅游、科研、娱乐于一体，为城南生活增添了馥郁花香。

丰台还有以北京园博园及永定河沿岸水系景观为依托的“园博飞花”，中国戏曲文化周、“花开丰台”端午文化游园会等文化活动多姿多彩，描绘着丰台亲自然、为百姓的文化特质。

各类自然生态公园是丰台的又一特色。北宫国家森林公园有北京最大的彩叶观赏区，青龙湖公园被誉为“京城夏日小海滨”，千灵山素有“七十二洞天，三十六福地”之说，南宫温泉生态旅游区是旅游度假好去处。

近年，丰台区因地制宜，不断巩固“疏解整治促提升”成果，就近建设嘉园城市休闲公园、新宫大街等口袋公园、城市绿地，把绿色生态空间建在老百姓家门口，提升了城市生活环境品质。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处，越来越成为人们共同的生活理念和城市建设者的文化情怀。

积聚南中轴区域文化崛起的势能

物阜民丰，人杰地灵。丰台正走在区

域文化建设的快车道上，若久久为功，则善作善成。南中轴区域文化的崛起，将成为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交汇成果。

未来，南中轴地区将构建以文化和国际交往功能为主导，以国际商务、生活服务和生态游憩等功能为支撑的五大功能体系，延续历史文脉，凸显新时代首都文化特色。南中轴丰台段北接永外地区，南至南苑机场，长约 8 公里。按照“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彰显区、大国首都功能的新兴承载区、北京南城崛起的核心引领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样板区、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的示范区”的定位，这里将打造成带动城市南部地区崛起的生态文化发展轴。

自辽代起，南苑便成为五朝皇家苑囿所在地，长期保持着以森林、草原、水泉为特征的园林景观，京城的许多官贾名士都曾到过这里，留下了深厚的文化遗韵。明代名臣金幼孜曾作《南苑篇》，描写南苑“柳间饮马春泉细，花里闻莺昼漏迟”。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也写过《南苑杂咏》。作为古都历史文脉和文化精华的重要承载地，丰台区将系统发掘和保护南苑地区的都城苑囿等文化资源，加强整体保护利用，建设南城最大的公园群落，构建特色旅游线路，塑造新时代大国首都文化魅力区域。

以首善文化建成首善之区。相信随着城市建设的提速增效，众多文化资源蕴含的精神基因，将在这座城市充分释放。在丰台，随时随地感触着文化的魅力，生活将更加自由、惬意、美好。

（作者单位：丰台区委党校）

【开栏的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丰台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是全民族抗战的起点，“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丰台人民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线，磨大刀、送干粮、救伤员，支援29军坚守卢沟桥，建“交通”、送情报、运物资，有力支持和配合平西、平南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2022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为了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我们深情回顾“抗战中的丰台”，重温烽火硝烟中的峥嵘岁月。

★民族危机笼罩下的华北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继续加紧侵略中国的行动，在东北地区推行殖民化统治的同时，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企图独占中国。日本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华北事变使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日本华北驻屯军是日本帝国主义根据《辛丑条约》驻扎在中国平津地区的日军部队，又称“中国驻屯军”。1901年义和团运动后，日本以“护侨、护路”为名，正式组成该部队，总兵力为2600人。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华北驻屯军兵力不断增强。

1935年日本在华北推行“防共自治运动”，迫使南京政府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继续推行吞并华北的政策。1936年3月下旬，日本陆军部为迫使宋哲元屈从，向华北驻屯军增加兵力。4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向天津增兵6000人，使华北驻屯军的兵力达到8000多人，到9月超过14000人。日方派遣步兵第一联队驻守北平城内外，天津军步兵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领主力部队驻屯在北平市内，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的

第三大队则驻守在丰台镇。由于丰台镇是北宁和平汉两线分道的重要地点，日军此举引起了中国方面的警惕，中日两军在此地不断发生“擦枪走火”事件。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北平外围的形势是：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军驻防；北平的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敌伪军；在西北面，有日军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等土匪队伍。仅有北平的南面和西南面，尚为第29军部队防守。

当时，北宁铁路沿线既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中国军队据此，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若为日本人所占，北平则变成一座孤立的死城。所以卢沟桥这一战略据点，成为必争之地。

1936年，日本加紧进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推进国家军事化进程，加快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国共两党趋向合作而联合尚未稳固，英、法、美等国给予蒋介石南京政府一定的援助但态度并不甚积极，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趁此机会对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以扩大它在中国大陆的殖民统治地区，同时缓和其国内矛盾，加强同其他大国对抗的地位。

卢沟桥和宛平城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平的咽喉，自古就是军事要地。日本侵略军的企图，是伺机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路，四面包围北平，从而加深冀察的“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作为桥头堡，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

日本兵像饿狼一般闯入华北门户，张开血盆大口随时准备发起攻击。

★卢沟桥畔浴血战

1937年春夏，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加紧军事演习。7月7日上午，日军又到卢沟桥以北地区进行演习。下午，日军驻丰台的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下进至卢沟桥北面回龙庙附近，举行夜间演习。19时30分，暮色降临，日军夜间演习开始，近600人的部队迅速行动。22时40分，在宛平城东北方向突然响起了枪声。少顷，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无理要求进城搜查，被中国驻军守城官兵拒绝。日军立即开枪示威，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方向城内发射炮弹，城内仅营房就被炸塌6间，士兵被炸死2人、炸伤5人。

事发当晚，中日双方进行了多次交涉。2时，日方对中方答复不满，强行要派队进宛平城检查，否则包围该城。

约5时，日军已在宛平城东、东南及东北侧展开包围态势。6时许，双方派出人员到达宛平县署，日方提出无理要求，仍坚持进城搜索“失踪士兵”，中方不许。

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主力在大队长一木清直指挥下，向回龙庙铁路桥扑来，要求在中国守军阵地搜寻“失踪士兵”，在铁路桥头遭到第十连排长中共秘密党员沈忠明的严词拒绝，日本侵略者突然开枪射击，沈忠明中弹倒地。他的牺牲，激怒

了守桥士兵，两个排在李毅岑排长指挥下，不畏强敌，英勇战斗，用大刀砍、枪刺扎，同日军展开了肉搏，几乎全部牺牲。日军占领回龙庙和铁路桥东头。与此同时，日军突然以宛平城东门为主要目标炮轰宛平城，炸毁了营指挥部，造成吉星文等人受伤。

第29军守城将士沉着应战，奋起抵抗，进攻的日军一次次被击退。8日下午，29军从长辛店以北至八宝山以南同时向日军反攻，将战斗开始不久失守的铁路桥及其附近的回龙庙等处夺回。此后三日内，双方在卢沟桥铁桥和回龙庙一带进行了数次拉锯战，双方均增援部队，战事逐渐扩大。

7月11日，29军收复桥头堡失地，完全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减轻了宛平城侧后的威胁。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和能力估计过低，对中国守军的坚决回击出乎意料。他们见势不利，采取缓兵之计，称失踪日兵已经寻获，向中方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先后4次与中方进行谈判。

7月21日，日军再次炮轰宛平城、长辛店中国守军。

7月26日，日军向29军发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中方“驻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之第37师，促其于27日正午以前，退至长辛店，又将北平城内之第37师与西苑之该师部队，同时退往平汉路以北区域，至本月28日正午为止，须迁至永定河以西之地带，嗣后仍须将此项军队运往保定方向”，遭宋哲元断然拒绝。

7月27日，日军下令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28日晨，日军出动飞机数十架掩护机械化部队向北平近郊的南苑、西苑、北苑发起全线进攻，南苑战线最为惨烈。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壮烈殉国。

7月29日凌晨，29军全军撤离北平，北平沦入敌手。7月30日，卢沟桥被日军占领。

★同仇敌忾赴国难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广大民众奋起支援，军民共同谱写了并肩抗战的壮歌。事变发生后，北平地下党组织立即紧急发动北平学联、华北各界救国会等29个抗日救亡团体成立抗敌后援会及各种支前抗日的组织，积极开展战地慰问、服务工作。7月8日下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救亡团体派代表到卢沟桥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当代表们带着慰问品到达宛平时，城门已经封闭，日军不断地向宛平城射击。守城官兵听说民众团体冒着炮火前来慰问，群情激昂。城上城下，军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交融在一起。

社会各界纷纷携带慰劳品到前线慰问，还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救护伤员，进行支援抗战的各方面工作，如募集一万条麻袋、一万件背心、一万包茶叶等等。还有些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武装。以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北平学生救国会为骨干，各学校先后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后方服务团，下设救护、宣传、劳军等专门工作机构，开展大量的救护、宣传、劳军工作，各校的宣传队活跃在大街小巷，到处可以听到慷慨激昂的演讲和激越高亢的《义勇军进行曲》《松

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鼓舞了士气。北平的磨刀人来到前线，为29军战士磨大刀。北平的黄包车夫来到前线，争抢着拉伤员进城救治。银行界筹集了大量的慰问品，送到前线。北平的市民踊跃募捐筹款为前方战士制作慰问袋，袋内装着毛巾、牙刷、牙粉、铅笔、日记本、鞋袜等。有的慰问袋上印有“诸位兄弟，尽忠报国，北平市民，誓为后盾”的大字，表示了与第29军共同抗日的决心。

处在战斗最前线的宛平城、长辛店等地的民众在战争开始之后，就为29军战士挖战壕、抬担架、运送弹药和物资。老年人冒着枪林弹雨主动为部队当向导，给城楼上站岗的士兵送茶送饭。妇女们忙着为战士们蒸馒头、烙饼、烧开水、洗衣被。

长辛店扶轮小学的童子军手里挥舞着写有抗日标语的旗帜，走上街头为29军将士募捐。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长辛店铁路工人自动地组成了担架队、侦察小组、支应处，前线的官兵受了伤，担架队员冒着枪林弹雨把他们救下来，侦察小组成员不怕危险，涉水渡河，侦察敌情。北平郊区的农民也为前线运送粮食、饲料、燃料。

28日晚，南苑战场溃败下来的官兵陆续涌进北平城，北平群众虽然知道他们打了败仗，但仍旧在马路两侧摆了不少西瓜、酸梅汤、馒头等食物，慰劳战士。有的学生主动给他们带路，有的市民还脱帽致敬。北平民众的有力支援、声援，对激励29军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北平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振奋了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也热烈地支援着北平抗日斗争。各地各界群众纷纷动员和组织起来，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征程。

南中轴的历史变迁（连载二）

北京中轴线，原指自元大都、明清北京城以来北京城市东西对称布局建筑物的对称轴。它北至钟鼓楼，南到永定门，直线距离长约7.8公里。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北京先后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中轴线两次向北延伸，并成为奥林匹克公园的轴线。2004年，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和变迁，市规划委提出将北京中轴线向南伸展，这条向南延伸的中轴线被称作“南中轴”。它北起永定门，南至南五环，经过木樨园、大红门、南苑等地区。这里曾是北京最大的湿地，湖沼众多，星罗棋布，水草丰美，不仅是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皇家猎场，而且是元、明、清三代北京最大的皇家苑囿。不仅如此，这里也是京南军事重地，佟麟阁和赵登禹两位民族英烈曾在这里壮烈殉国，其爱国主义事迹可歌可泣。

南中轴是中国航空、航天两大事业的发祥地，中国第一座飞机场、第一所航空学校、第一家飞机修造厂就产生在南苑，中国运载火箭的研制和航天事业的摇篮也在南苑的东高地。因此，南中轴不仅在历史上就是北京的生态和文化之轴，而且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蓝天、向太空翱翔和探索的龙兴之轴、发展之轴、腾飞之轴，是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中轴一带的城市发展及人民生活日新月异。大红门地区服装商业风生水起，逐渐形成繁荣兴旺与脏乱无序并存的“浙江村”。随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国家战略的推进落实，丰台区将做好大国首都南中轴的文章，高标准规划建设占地1.6万亩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再现“南园秋风”的美丽景象。同时，高水平规划建设首都商务新区，全力打造彰显中华文化自信、承载古国首都功能、引领城市南部地区崛起、示范生态文明与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的生态文化发展轴。

本刊从2021年第2期开始，用“北京最大的皇家苑囿”“华北军事重地”“中国航空事业的兴起”“南中轴从这里腾飞”四个部分，讲述南中轴的历史变迁。本期刊载第二、三、四部分。

（二）华北军事重地

1. 从神机营到北洋陆军第六镇

北京是元、明、清三个朝代的都城，南苑是北京的南大门，是重要的军事要地，历代都有重兵驻守。实际上，作为皇家狩

猎苑囿的南苑，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练兵和阅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严重窘境，鉴于英法联军进犯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惨痛现实，清政府急感京畿驻兵、拱卫都城的迫切性。

清同治元年（1862）以后，南苑由皇

家苑围逐渐成为京师军事重地。同治十二年（1873），清政府在南苑增设了神机营。

《光绪顺天府志》记载：“神机营衙门，在崇文门内煤渣胡同……每年两季，拔队前赴南苑，扎营操演。”清代震钧《天咫偶闻》记载：“……同治以后，神机营各军，岁往驻扎，以秋去春归，军容极盛。”

神机营是清晚期创建的一支使用新式武器的禁卫军。神机营这个名称，早在明代的时候就有了，但明代的神机营相当于清代的火器营。道光十九年（1839），御前大臣奕纪上奏请示组建神机营，并把印信都铸好了，但没有建成。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进了京师。这之后，清朝才感觉建立一支近代化军队势在必行。于是第二年组建了神机营，兵员是从八旗原有的禁卫军诸营中选出来的，新组建时共有兵员1万名，设置专操大臣16人，帮操侍卫章京22人，带队章京196人统辖，到同治时增至约3万人。神机营衙署就设在崇文门煤渣胡同。神机营使用的武器是西方近代武器装备，正因为这一点，神机营组建后就成了清末禁卫军的主力，其官署的规模也空前的庞大。同治初的时候，左、右翼技艺队习洋枪洋炮，称“威远队”。光绪年间，马步队改名为“威霆制胜队”。

神机营为军事编制，与五军营、三千营合称清军三大营，又称京营。神机营由精锐官兵组成，守卫紫禁城，皇帝亲征时随军出征。神机营旧址在今南苑庀殿村东边。营里建有营盘22座，瓦房59间，灰房713间，土房3646间，营门46座，濠墙424丈。神机营分为左翼、右翼、中营，共驻扎官兵14000余人。光绪年间，神机营有马、步队25营。据北京图书馆所藏的

光绪年间《南苑全图》所显示：南苑神机营21处兵营中，有马队10处，马炮队1处，抬枪4处，炮营、洋枪各2处，排枪、中营各1处。

神机营主要负责紫禁城及三海墙外的巡缉守卫，皇帝出巡则扈从警蹕，同时它又是清政府用来控制全国的战略机动力量。每天，神机营的管带1员、营总1员，各带兵10名，守在宫中值房。队官4名，各带兵20名，分驻在皇宫的四角值守。而负责三海墙外守卫的神机营官兵会同八旗各营的枪兵技勇之士，共810名轮流值宿，内分为10班，每日更替1班，值守时还要传筹走更。

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同治皇帝亲往南苑晾鹰台检阅神机营的官兵，这是清朝皇帝最后一次在南苑阅兵。以后的光绪、宣统两朝皇帝再也没有进行过。

清朝的神机营尽管使用了新式的洋枪洋炮，装备有精良的火器，但由于士兵主要从满洲八旗中产生，神机营的首领也多由满人担任，因而它也难逃八旗兵腐败灭亡的厄运。神机营创立后，因国力衰败、俸饷短缺，部队疏于训练，八旗子弟恶习严重，因而战斗力较差。正如光绪十一年（1885），神机营王大臣奏称的那样“该厉兵若不激发天良，勤加练习，必至糜饷辜恩，毫无实济。”因而，慈禧太后发下懿旨，要求各该管大臣务必要领会朝廷实事求是的意图，振作精神，实力整顿，“以期营务日有起色”。然而，懿旨归懿旨，神机营的战斗力的确丝毫未见起色。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有感于清军战斗力的衰弱，决定仿西洋之法编练新军。起初，派广西按察使

胡燏棻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组织实施，所练新军命名“定武军”，聘请德国人为教官。次年改派袁世凯督率训练，更名为“新建陆军”。戊戌政变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奏设武卫军，以聂士成驻芦台为前军，董福祥驻蓟州为后军，宋庆驻山海关为左军，将袁世凯之新建陆军改编为武卫右军。而荣禄则率中军坐镇南苑，节制各军。1901年，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人们也就把他的武卫右军改称“北洋新军”。北洋新军形成后，神机营实际上被取代。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袁世凯以“边防吃紧，兵力不敷分配”为由，建议在全国成立新军三十六镇，先在北洋成立六镇。经清政府批准后，他首先将原有北洋“左”“右”两镇募足兵员，正式成立北洋常备军第一、第二镇，以王英楷、吴长纯分任统制。随后又将“巡警营北段”扩编为第三镇，以段祺瑞为统制。“巡警营北段”是袁世凯建立北洋军的老本钱，其各级军官追随袁最久，因此袁世凯对第三镇特别重视。1905年上半年，袁世凯又陆续将原武卫右军和自强军主力混编，成立北洋常备军第四、第五镇，以王士珍、吴长纯（吴凤岭接任第二镇统制）分任统制。与此同时，负责警卫京畿的“京旗常备军”也改编成镇，凤山任统制。

北洋常备军实行镇、协、标、营、队、排、棚的编制序列。镇是它的基本战略单位，编制相当于现代的师。每镇下辖步队2协、马队1标、炮队1标、工程队1营、辎重队1营，还编一个军乐队。全镇官兵夫役一般在1.2万人左右。

1905年6月，全国新军统一番号，京

旗常备军称北洋第一镇，原北洋第一镇改称第二镇，原第二镇改称第四镇，第三、第五镇番号不变，第四镇改称第六镇。至此，北洋六镇正式建成，主要承担拱卫京师和驻防京畿任务，全军兵力近7万人，除第一镇由满人铁良任统制外，其他五镇均由袁世凯亲信将领任统制。可以说，北洋六镇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产物，作为清末新式陆军的一支骨干力量，其编制体制和训练方法对全国各地军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北洋六镇的编成，标志着北洋军阀势力的形成。袁世凯以此作为实力基础，继续扩军，并大肆攫取政治权力，终于形成了一个北洋军阀统治的新时期。

北洋陆军第六镇派驻南苑，并在此修筑驻兵营房。驻在南苑的军队有七个营，在南苑镇由西营房往东设有7座营房，至今仍留有七营房旧址和三营门、六营门的地名。

1906年，为了适应北洋陆军第六镇驻扎的需要，修筑了京苑（北京至南苑）轻便铁道，该铁路支线于1906年2月动工，1907年2月建成通车，全长7.59公里，归军队管理。京苑铁路为窄轨铁道，设有永定门、大红门、营市街（今南苑镇）等站。清代兰陵忧患生《竹枝词·南苑驻军》是赞颂京苑轻便火车的诗：“一六森严两镇兵，分屯两苑卫神京。往来南苑尤称便，军用火车已畅行。学堂各省一齐开，都为中华养将才。今日指挥试兵法，调他南苑陆军来。”此诗“一六”两字指清代的陆军第一镇驻北苑，第六镇驻南苑。“学堂”两字指各省都可以兴办军校，但毕业生必须送陆军部考试，并调他们到南苑陆军部，验其指挥各法。

1907年，北洋军第六镇因换防离开南苑，由良弼所统领的新编警卫军入驻南苑，良弼为招揽军事人才，聘请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蒋百里任标统（团长）。蒋百里表示：“此职对我不是屈就，而是高攀。我在日本是排长级的尉官，在德国升任连长，今后宜作管带（营长）。”蒋百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专家，著有《国防论》《欧洲文艺复兴史》等著作，曾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23年，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练兵，聘请蒋百里每星期到军中讲演一次军事学，足见蒋的影响之大。

2. 万字地与南苑镇的形成

南苑作为市镇出现开始于清末，它的形成与“万字地”有关。有关“万字地”名称的由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南苑地区寺庙多，佛教多用“卍”，从唐朝列入汉字，并读“万”音，因而这里就被称作“万字地”。另有一种说法，这里曾驻有万字队，万字地因“万字队”而来。

光绪二十八年（1902），慈禧太后下懿旨拍卖南苑的荒地，垦荒的地主庄园从河北、山东招来一批农民种地，也在该地落户，成为镇上居民。随着苑内居民大量聚居，市肆日渐繁华，以万字地为中心，形成了今丰台区南苑镇的雏形。南苑建镇初期只有万字地、营市街、北小街。营市街以营盘为中心，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面叫北营市街，俗称营市街，南面叫南营市街，俗称南小街。据民国初年南苑地图显示：南苑营盘除陆军驻军外，还有飞艇（飞机）厂、飞艇教场和存艇厂。起初，南苑镇只有少数摊商在此聚集，之后，随着集镇的发展，又建了小学校、邮局等，成了

工、农、兵、学、商“五脏俱全”的城镇。南苑电话局开通较早，于1905年10月在南苑万字地营房，采用磁石交换机制式，容量100门。1925年移至荷塘街，改为供电交换机制式，容量200门。商业金融也随之发展起来。1913年，设立南苑税局。1929年，组建成商民合作银号，以后又开办了华昌厚、鸿兴源两家钱庄，开展汇票兑换业务。到20世纪30年代，南苑镇已相当繁华，这里有澡堂、照相馆、棺材铺、铁铺、席铺、布铺、旅店等各类商户近300家。镇内餐馆和小吃店云集，有永兴楼饭馆、忠厚居饭庄等近30家，还有汤锅、鱼铺、菜铺、挂面房、面菜铺等。

南苑镇因清末驻有重兵而形成，因建飞机场和飞机修理厂而发展壮大，京苑轻便铁道经此出入京城，使南苑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成为北京城南重要门户。南苑镇最初称作“南苑万字镇”，1937年9月至1948年冬，这里先后为日伪大兴县政府、国民党大兴县政府驻地，1937年9月从大红门迁来其驻地时名万字镇营市街，即今新华街5号。当时的档案记录为“于九月十五日移于南苑万字镇，即旧营市街，在北大红门西南十二里，成为管理全县之正式机关”¹因此地居南苑皇家园林中心地区，又紧临南苑机场，而名南苑镇。1948年12月划归北平市管辖，设立南苑区。1949年4月改为第23区，同年6月与15区合并为14区，1950年8月改为第11区，1952年改为南苑区，1958年撤销南苑区建制，南苑镇划归丰台区管辖。1949年至1958年，南苑镇一直是南苑区政府驻地。1954年南

¹ 参见《北京档案》2016年第09期，李丙鑫著《档案图说大兴县署署址的变迁》一文。

苑镇政府改为南苑镇办事处，1990年改为南苑街道办事处。1959年9月东高地街道办事处成立，三营门大街以东的西洼地、东高地、六营门、万源路之间地片划归东高地街道办事处。

南苑镇作为北京的南大门，军事重地，形成发展虽只有百余年的时间，但为我国的航空事业创造了诸多“第一”，包括第一批北洋新军、第一所航校、第一个航空基地等。南苑镇现存古迹较多，有南苑机场、北京兵营（陆军检阅使署）、昭忠祠纪念亭、冯玉祥荷塘街故居、伪大兴县政府、国民党大兴县政府旧址、南苑区政府旧址、中共南苑区委旧址、基督教南苑堂、南苑清真寺、日军飞机窝和碉堡。南苑镇有南苑医院、南苑中学、南苑公园、南苑电话局等。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就坐落在南苑镇。

百年老镇南苑多是由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农民集中居住的简陋平房。区域内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低收入家庭集中，居住房屋破败老化，公共设施陈旧落后。从2009年开始，丰台区政府采取政府主导、绿地置换、房屋安置、定向对接的方式对南苑镇棚户区实施改造。已建成南庭新苑南区、北区，阳光星苑、公园懿府、天悦壹号、金府大院等一大批住宅小区，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南苑的城市面貌正在逐步改观。

3. 历史上的南苑阅兵

阅兵是一种对武装力量的检阅仪式，同时也是一个展示国家实力的活动。早在4000多年前，史籍中就有“观兵以威诸侯”的记载。此后，中国历朝历代都举行过阅

兵活动，到了清代顺治、康熙、乾隆时期更盛行一时。

康熙曾先后12次前往南苑阅兵练武。南苑举行的阅兵仪式在清代所有军事阅武中典制最高、规模最大。阅兵一般还要选择吉日举行，各项活动安排都有严格的规程，如官兵器械、旗纛、枪鼓、金鼓等各有定数。然至雍正皇帝时期，因帝忙于政务，只有2次临幸南苑进行大阅。雍正七年（1729），在发动西征准噶尔战役的前夕，雍正皇帝为鼓舞军队的作战士气，在南苑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

乾隆皇帝非常重视南苑大阅之典，在位期间曾4次在晾鹰台举行大阅，把清代大阅之典推上了巅峰。最闻名的大阅典礼则是乾隆四年的首次南苑大阅，盛况空前。乾隆皇帝作《大阅》诗：“时狩由来武备修，特临南苑肃貔貅。龙骧选将颇兼牧，天驷抡才骥共骝。组练光生残雪映，旌旗影动朔云浮。承平讵敢忘戎事，经国应知有大猷。”以这次大阅为题材，清朝宫廷画师金昆、郎世宁等10人绘制了一幅长达十五公尺的《乾隆大阅图》，将大阅典礼威武雄壮、气势磅礴的景象活灵活现地展示给世人。乾隆二十三年（1758）的仲冬，乾隆皇帝在南苑举行了即位以来的第二次“阅武大典”。这次还特邀哈萨克、布鲁特、塔什罕等几位回人首领前来观看，以军威示西域。阅武之后，乾隆皇帝作《仲冬南苑大阅纪事》诗：“廿年一举宁为数，周礼分明节候论。便设军容示西域，伫看露布靖坚昆。好齐以暇千旂飏，既正还奇万炮喧。风日晴和土挟纩，非予恩也总天恩。”不过乾隆皇帝对这次阅武大典并不满意，尤其是他要求受阅队伍中要有两千骑兵驰

骤于晾鹰台下未能实现，令他十分气恼，口谕只犒赏参演官兵，对演兵诸大臣们则一律取消。这件事显示出乾隆皇帝对阅兵大典的极度重视。

乾隆朝代后期开始，国事日渐艰难，大清帝国由盛转衰，南苑的阅武活动次数和规模明显减少。至清末的百年间，南苑内共举行了3次阅兵仪式，其中2次在嘉庆时期，嘉庆十七年（1812）三月壬辰，上御晾鹰台，大阅八旗官兵；嘉庆二十三年（1818）三月庚子，驻蹕旧衙门行宫。甲辰，上行围，大阅。清朝皇帝最后一次在南苑阅兵是同治十二年（1873），当时的大清王朝已经江河日下，尽管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也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暂时稳定了时局，但大清王朝已经腐朽不堪。此时同治帝在南苑晾鹰台阅兵，其目的就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和权威。

清末民初，尽管皇家苑囿被荒废。但南苑的军事地位不仅未降，反而愈加突出。由于北洋军进驻南苑，并在此不断演习操练兵马，使得南苑成为北京地区极为重要的军事重镇。再加上飞机场、飞机修造厂以及航空学校均设在南苑，其独特的军事地位不言自明。在袁世凯当政期间，李纯所部陆军第六师及张敬尧所部第三混成旅曾先后驻军南苑。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将每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日），定为国庆日（“双十节”）。自1912年正式改民国纪元以来，首任大总统袁世凯只举行过3次“双十节”纪念活动，均由官方组织主持，民众参与，却没

有开展过大规模的庆祝活动。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原武昌起义时被推举出的湖北军政府都督、中华民国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1916年10月10日，值中华民国成立5周年，新上任的大总统黎元洪决定隆重庆祝一番，北京的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古物陈列所（今故宫博物院前朝部分，设清政府辽宁、热河两行宫）均对百姓免费开放一日。更在南苑操场举行了北洋军阅兵仪式，借机展示军事实力。

10月10日这一天，北京城馨，晴空万里。清晨六七点钟开始，就有民众早早地来到街道两旁，到了上午九点，更是万人空巷，想一睹大总统黎元洪的风采，也领略一下民国新军的风貌。

阅兵开始前，一身戎装的黎元洪和一众官员们乘马从演武厅前往检阅现场。身材魁梧的黎元洪，挎着军刀，骑着高头大马在前开路，众文武干将紧随其后，威风凛凛，精神抖擞。阅兵正式开始，打头的是陆军方阵，分骑兵和步兵两个兵种，官兵们精神饱满，头戴白缨或紫缨的军帽，军服分蓝衣和黄衣两种，分别佩剑荷枪陆续前行，参加人数有五六千人。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后，中国陆军正式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不仅军装学习西式，训练方式和部队编制也效法西式。陆军方阵过后，在京的高级官员如孙武、蓝天蔚、荫昌、江朝宗等，也在仪仗兵的引导下，骑着高头大马鱼贯而过。

随即是大总统巡阅部队。一辆汽车开来，看台上一片骚动。当时汽车在中国是

个稀罕物，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特别是没有如此仔细观察过。敞篷的汽车上站立着两人，一个是大总统黎元洪，另一个则是总理段祺瑞，两人并肩而立。大总统莅场后，军乐团奏军乐，全体官兵行礼，其中军官行撇刀礼，步兵行举枪礼，骑兵行马上举刀礼。阅兵总指挥官陈光远上前大声报告阅兵部队数目。随后，在总指挥官的引导下，大总统黎元洪依次检阅了各方阵，各方阵的师长、旅长、团长在大总统到达之时报告并行礼随同检阅。其后，各参阅部队以营为单位，在大总统离队伍二十步时，行举枪口令，吹军号，以壮军威。为了确保这次阅兵顺利有序进行，北洋政府还制定了详细的检阅程序，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巡阅结束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回到演武厅。操练开始，司号员用号音调度变换队形，表演各种军事操练。黎元洪、段祺瑞阅操看得尤其认真，不时点评一番。操练结束之后是航空表演，由当时的航空校长亲率3架飞机飞行。飞机从南苑起飞，在先农坛、正阳门上空绕飞数周，供大总统、政府官员和民众检阅。这次盛大阅兵的圆满举行，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后，南苑也多次举行了阅兵。1926年10月10日，国务总理顾维钧、奉系将领张学良等在南苑阅兵，飞虎队（成立于1923年9月，张学良接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兼任航空学校校长。航空部队编为飞龙、飞虎、飞鹰三个航空队）12架飞机参加受阅。1936年10月10日，冀察绥靖公署委员长宋哲元在南苑阅兵，并招待外宾。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于1945年12月11日

乘坐“美龄号”专机，出人意料地由重庆飞抵北平。他宣称，中国要想保持住四大国（中、苏、美、英）之一的地位，国人必须自救，必须在道德上加强建设。12月18日，蒋介石、宋美龄一行人离开北平。临行前，在北平南苑机场举行新闻发布会。蒋介石一生曾四次来到北平。1945年12月这一次是蒋最风光的一次。

新中国成立前夕，南苑成为开国大典受阅部队的训练基地。我军的第一支飞行队在这里建立并经过刻苦训练后，在开国大典中飞过天安门上空。解放军的步兵也在南苑进行了受阅训练，曾在晋察冀一分区负责训练的李川青任开国大典南苑集训部队的副总指挥。此后，南苑多为国庆阅兵的训练基地，如1959年的十年大庆的方队集训；2009年六十年大庆的飞行编队训练等。

4. 冯玉祥三到南苑

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100周年之际，接见冯将军的亲属时满怀深情地说：“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业，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投淮军当兵。1902年改投武卫右军，历任哨长、队官、管带等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第11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等职。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北洋政府，驱逐末代皇帝出宫，并将其所

部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后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后因与蒋介石集团发生利害冲突，举兵反蒋，先后爆发了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1935年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在美国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194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同年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自美回国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遇难，享年66岁。

冯玉祥将军戎马一生，在清末至民国初年，他曾先后3次驻军南苑。第一次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调动武卫军由保定移兵南苑，冯玉祥随军前往。兵驻南苑后，武卫军改称北洋军第六镇，冯玉祥所在的第三营分为前后两队。他由哨长升为司务长，同年七月又升任后队排长。两年后，邮政大臣徐世昌升任东北三省总督。北洋第六镇奉命随徐世昌开赴东北，冯玉祥随军离开南苑。第二次是1912年冯玉祥率部回到南苑，任左路备补军前营营长，不久又随军离开。第三次是1922年冯玉祥被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任命为陆军检阅使，驻防南苑。使署设在南苑航空署旧址（在南苑机场内），又称七营房。冯玉祥办公室则设在城内旃坛寺鹿钟麟营地。所部有一个师（第11师，下辖第21、22旅），三个混成旅（第7、8、25混成旅）。后遭段祺瑞和张作霖的排挤，被迫率兵离开南苑。这次在南苑驻军期间，冯玉祥抓住有

利时机，因势利导，治理了永定河水患，修建了昭忠祠，进行了“草亭密议”，发动了“北京政变”等，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1922年11月10日，冯玉祥乘火车抵京，大总统黎元洪的代表、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等到车站迎接。冯下车伊始，即令参谋长蒋鸿遇等拟定陆军检阅使署编制，并于次日前赴南苑，组建北京陆军检阅使署，开始了他为期两年多的陆军检阅使的军旅生活。

到达南苑后，冯玉祥即向部队宣布了有关纪律，规定当兵的一律不准坐洋车，官兵要买卖公平，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同时，取消了南苑地区有碍于风化的妓院、烟馆。提倡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女学，让女学生穿衬衣、裙子，实行文明教育。在南苑还专门办了培德学校，并在通州设立了分校，教育官佐眷属学习文化、专业技术。经常组织部队对镇内的环境卫生进行整治，并定期检查；在南苑大搞绿化，自南苑经大红门乃至永定门的大路两侧全都种上了八尺高的树木，使得镇容镇貌大加改观。他还特别注重爱国思想的宣传，当时大红门地区的墙上曾书有“亡国奴不如丧家犬”“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巨型标语。后有人著文盛赞冯玉祥将军“彼率重兵坐镇于此者垂一年，京畿治安秩序之佳，为民国以来所仅见”。

陆军检阅使名义上代表陆军部负责会操及检阅部队，协调各军行动。实际上系因人设事，有职无权，或职大权小，只能检阅自己所属的部队，不能检阅别人的部队。在此期间，冯玉祥积极组织所部开展大练兵。1923年1月初，冯玉祥分别给所

部连长以上官员讲话，进行练兵动员，强调军法严明，赏信罚必，并讲军史，以鼓舞士气，激发斗志。其练兵分为学、术两科。按兵、目、官编成不同班次，依据不同要求，进行不同训练。学科除了学习《军人教科书》《军人宝鉴》《兵器学》等外，还注重精神教育及军史教育；术科的训练项目，主要有刺枪、劈刀、体操等。此外，还举办教导团、学兵团等，培养部队干部。在两年多时间，造就了约3万名骁勇善战、纪律严明，且具有爱国精神的劲旅，终于成为当时之雄，为日后的西北军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这次练兵，史称“南苑练兵”，以别于此前驻兵湖南时的“常德练兵”。

冯玉祥长期经费拮据，加之陆军检阅使是个虚职，他曾戏称自己是个“贫困的陆军检阅使”，领军械弹药更是无门，经四处奔走，多方呼吁，由崇文门税关和绥京铁路局两处每月合拨15万元以充军费。因此，他和广大官兵一样，过着清苦的生活。在兵营里他经常穿着和士兵一样的粗布军服，同士兵在一起蹲着吃贴饼子、喝白菜汤，而且不许剩菜剩饭。除非接见外宾等特殊情况，他从不穿皮鞋及高档的衣服。1924年2月19日，他和李德全（后来是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女士在南苑演武厅结婚时，也只穿一件灰布大褂，黑礼服呢便鞋。他的干娘尹老太太问他为什么在结婚这样的大事上都不换件好衣裳，他说：“您老人家不知道，人不能驴粪蛋子外面光，将老百姓吓唬住。官越大越不能特殊，否则老百姓不佩服。”他严禁请客送礼，尤其禁止下级给上级送礼。他还利用各种机会给老百姓办事，经常在宴请宾朋的便宴上拿出化缘簿请宾客为灾区人民捐款。

冯玉祥不但精于治军，严于律己，而且善于治水。1924年入夏以来，北京地区连降大雨，永定河水势暴涨，水流湍急，由于人员少，抢修无效，永定河大堤先后决口4处，堤外数百里尽成泽国，人畜漂荡，田庐淹没，为百年罕见之奇灾。地处丰台南的黄土坡堤岸，被特大洪水冲开缺口达140多丈，虽经永定河河务局率领民工竭力抢修，也未能脱险，河水严重地威胁着河堤左侧的京奉铁路和沿途数百个村庄。7月8日，水势更大。面对迫在眉睫的险情，冯玉祥当机立断，火速派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师长李鸣钟率领部下2000余人赶到大堤协助。自营长以下干部，身先士卒，同士兵、民工一起负薪捧土，与洪水搏斗，接连几昼夜守护在河堤危险地段，随溃随抢。由于水流过急，水势汹涌，为确保沿河村庄及铁道的安全，冯玉祥毅然命令数千官兵就着残余土坡加筑新堤，夜以继日，紧张劳作，一个月后，一条几百丈长、形如弯月的新大堤屹立在了永定河畔。沿岸百姓为对其表示感激之情，于是把新堤叫做“冯公堤”。永定河河务局于1925年1月在紧靠永定河大堤之卢沟桥南北天堂村西龙王庙前，镌刻了冯检阅使德政碑，以示纪念。

南苑自清代以来一直是驻军重地，军中老、病而死的人就埋在义地。南苑原有两块义地，冯玉祥这次驻兵南苑后，为旌表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讨伐张勋辫子军和第一次直奉战争郑州战役中阵亡的官兵，使他们的精魂忠骨得以安息，经当时大总统曹锟批准，用银圆5000元，于1922年冬，在南苑镇西南购置了30多亩土地，筹建昭忠祠（又称劝忠祠），

1924年9月10日举行落成典礼。这就是当地人们俗称的冯玉祥义地。

昭忠祠大门在东南方向，门额是冯玉祥将军亲笔书写的“气壮山河”四个大字。大门前有石碑坊，两侧有一对大铁狮子，石碑坊毁坏得较早，两个大铁狮子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也遭到损毁。周围建有土墙，墙外有一米半深的水沟。昭忠祠南面是一座上房5间，厢房6间的院子，正中一座亭子。北面是一片广阔的坟地，埋葬着历次战斗中阵亡的官兵骸骨，墓草青青，碑石林立。冯玉祥将军专门撰写了《南苑劝忠祠碑记》，并请清代状元山东潍县王寿彭书写碑文，碑为方形，高约2米，立于义地大平台上，四周砌以青砖。冯玉祥还写了“为国捐躯”“成仁取义”的匾额和“从转战川湘陕豫而来身作国殇先吾辈诞生登天路；试回思患难辛苦之侣睹兹庙貌是男儿绝好下场”的对联。又于1924年6月24日题诗二绝以为纪念，其诗为：“一死能叫国自强，忠心耿耿日争光。问谁洒得同情泪，鹃血飞红染夕阳。”“捐躯报国各逞雄，正气凝成五色虹。侠骨英灵何处认，岷江风雨郑城东。”当年，义地修整完毕后，冯玉祥曾派专人守护。每到清明时节，他还亲自到义地为阵亡官兵扫墓添坟。

冯玉祥虽属直系将领，但受革命思想影响，反对袁世凯称帝，讨伐张勋复辟，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受吴佩孚排挤，冯玉祥对曹锟、吴佩孚不满，同时受孙中山代表徐谦影响，密约反戈倒直。是年9月10日大名镇守使、第15旅旅长孙岳趁南苑昭忠祠建成之际，专程前往祭奠。冯玉祥与孙岳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昭忠祠草亭内秘议倒戈讨直，制定了推翻直系政权的

计划，并合影留念。当时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掌握着军政大权。曹锟以每个人至少五千银圆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被选为“大总统”，世称“贿选总统”。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在河北省东北部的滦河、山海关一带激战，吴佩孚任“讨逆军总司令”，到前线督战。冯玉祥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当时在赤峰一带活动，他看到北京防卫空虚，趁机从前线率部兼程回到北京南苑（南苑机场内北京兵营司令部），发动了北京政变。22日晚他电邀聂宪藩、孙岳、薛之珩、赵玉珂等军警长官在旃坛寺召开紧急会议，同时派兵驻守正阳门东西车站及丰台、长辛店等处要地。孙岳得知冯玉祥回京，迅速将军队开往保定，截断保定吴佩孚军队的辎重，并担任丰台、廊坊间防务。此时冯玉祥第15混成旅及孙岳1团与吴佩孚三师留守兵在丰台发生遭遇战，得陕军第1师师长胡景翼援助，将吴军包围，迫令缴械。同日，冯军第八混成旅与吴军二十四师（豫军杨清臣部）在卢沟桥也互相冲突。23日凌晨，冯玉祥进入北京，占据交通要道、重要机关，派兵包围总统府，囚禁了总统曹锟，接管北京全城，推翻了直系军阀的反动统治，直军在前线全军覆灭，吴佩孚率残部3000余人从海道仓惶逃亡汉口。曹锟下停战令和罪己诏，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等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孙岳、胡景翼任副总司令，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2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共商国事。此外，决定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皇宫，11月4

日摄政内阁会议决定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次日，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令溥仪出宫，移居什刹海醇王府，从此帝号被废止。1925年1月，冯玉祥受到段祺瑞、张作霖的排挤。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整编为6个师，人数在15万左右，取消国民军番号，称为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同月13日，冯赴张家口。3月冯在张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冯玉祥自此离开了京城，再也没有回到南苑和丰台地区。

5. 佟麟阁血洒大红门

“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这是抗日英雄佟麟阁在南苑一次军事会议上誓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慷慨誓言。

佟麟阁，原名凌阁，字捷三，1892年10月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边家坞村。1912年，佟麟阁投笔从戎，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随冯玉祥南征北战，剿匪平藩，屡立战功，深为冯玉祥器重，先后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讨蒋失败后不久，佟麟阁与冯玉祥解甲归田，总结以往斗争的经验教训，寻求救国之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炮轰沈阳北大营，燃起侵略中国的战火。1932年，佟麟阁应第29军军长宋哲元的邀请，出山任职。1933年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宋哲元任命佟麟阁为张家口警备司令，安定后方。2月，日军向长城各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进犯，中国驻军奋起抗战，29军奉命在喜峰口抗击日寇，将士在前线激战时，佟麟阁在后方

积极备战，维持局势，保障供给，使前线将士无后顾之忧，保证了长城前线战斗的胜利。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为总司令，佟麟阁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代主席，领导对日作战，保卫察省，收复失地。佟麟阁积极与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等密切配合，出兵张北，先后收复察东康保、宝昌、沽源，又乘胜挺进克复多伦。后因国内政治形势的压迫，冯玉祥被迫撤销抗日同盟军，宋哲元回察主政。佟麟阁深感抗日志向难以实现，而山河破碎，国运垂危。他不胜悲愤，于是退居北平香山寓所，以待报国时机。

在隐退期间，宋哲元再三敦请佟麟阁出山，负责军事。第29军各师长冯治安、赵登禹、张自忠、刘汝明等联名相邀。此时平津大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共产党的号召下日益高涨。佟麟阁感到抗日救国之日到来，就任第29军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团团长，还兼大学生军训班主任，住南苑29军军部，主持全军事务。他表示“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行，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佟麟阁誓言激越，闻者热血沸腾。

七七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军队的猖狂进犯，佟麟阁在南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慷慨陈词，他以29军军部名义向全军官兵发布命令：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当时《北平时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再现佟麟阁率军抗敌的情景：“佟副军长善治军。29军纪律严明，勇于作战。而于老百姓则秋毫不犯，佟将军训练之力也。当七七后，军士于烈日下守城，每一队前，置水一桶，用开水

以止渴。商民感激欲泣，竞献西瓜，坚却不受。对老百姓恭而有礼，杀敌则勇猛无伦，堪称模范军人。”

佟麟阁素来孝敬双亲，爱抚妻儿。但是自从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虽然设在南苑的指挥部与北平城内寓所近在咫尺，但将军从战争开始从未回家。激战之时，父亲病重，他则因为战事瞬息万变而不肯片刻离开营地。夫人生日，希望将军回家团聚，但由于战事紧急，他回电话说：“国难当头，军务紧急，大丈夫应当效马援，马革裹尸还乡。”

7月11日，日本政府委任香月清司为华北驻屯军司令。中日两军在卢沟桥一带战事不断。29军军长宋哲元在全国抗战呼声和佟麟阁等将士坚决请战的影响下，决心抗敌，并调到赵登禹所部132师来北平增强防务。至7月27日，由于日军扩大侵华战争，平津形势愈加危急。宋哲元军长下令军部撤回北平城内，并命增援北平的赵登禹师长为南苑战场指挥官。但副军长佟麟阁不愿随军部回城，决心与赵登禹共守南苑。

7月28日，日军第20师团调集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共计1万余兵力，在数十辆坦克、100门大炮和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从南、西、北三个方面向北平发动进攻。南苑是日军进攻的重点，是第29军军部所在。当时守卫南苑的除29军军部直属各处科外，还有直属炮、工、交各营，后勤、医院、特务旅所属两个团军官教导团、军事训练团、骑兵第9师一个团，第37师炮兵团和一个步兵团等战斗单位和后勤部门，约7000人。其中，步兵四个团的兵力5000余人，军事训练团1500余人。

佟麟阁誓死坚守。他说：“既然敌人找上门来，就要和他死拼，这是军人天职。”日军见久攻不下，便派飞机前来助战。佟麟阁率部队向北转移，准备进入北平。在大红门又遭到日军的包围。佟麟阁立即组织部队突围，不幸被敌机枪打中右腿。他骑上战马继续准备冲杀，战至中午时分，他来到凉水河北岸的九龙山，观察撤退官兵的情况。下午1点多，一群飞机来袭，对29军将士低空扫射，佟麟阁头部中弹，壮烈殉国，时年45岁。佟的副官高洪锡将佟背到村乔德林菜地，用树叶掩藏起来。佟麟阁殉国后，他的遗体，由中国红十字会、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率警卒10余人于7月29日在大红门寻获。佟将军全身浴血，面目模糊难辨。忠骸运回北平城内，佟夫人及其子女含悲收殓，隐姓埋名，寄厝于雍和宫附近柏林寺。老方丈仰慕将军为国献身精神，保守寄柩秘密，直到抗战胜利。

南苑之战是七七事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也是事变中最惨烈的一次恶战。就连日军第一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都承认，“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中国兵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一位曾经参加过南苑之役的日军老兵也对日本NHK电视台的人回忆说：“从没有遇到这样顽强的中国军人”。

佟麟阁将军是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追晋佟麟阁为陆军上将，8月5日，深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救国时报》载文敬悼佟麟阁将军，称他英勇奋战，光荣地完成了保国卫民的天职，是全国军人的模范。

毛泽东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

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45年，北平市政府将西城区的一条街改名为佟麟阁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香山脚下的佟麟阁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1979年，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发出通知，追认佟麟阁为抗日阵亡的革命烈士。2009年9月，佟麟阁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9月，佟麟阁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2015年8月，佟麟阁将军墓名列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6. 赵登禹南苑殉国

在丰台区宛平城东门外的拐弯处，西道口铁路桥的北侧，有一处烈士墓，长眠着一位血战南苑直至壮烈殉国的民族英烈，默默地见证着80多年前他为捍卫国家主权、抵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而英勇杀敌的壮烈场景。这位民族英烈就是赵登禹将军。

赵登禹，字舜城，山东菏泽县杜庄乡赵楼村人。1898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7岁进私塾，后辍学。13岁时，拜家乡颇有名气的武术教师朱凤军为师，对太极、八卦、少林等拳术及刀、枪、剑、戟诸般兵器十分娴熟，尤善徒手夺刀、赤手夺枪。

1914年春，16岁的赵登禹与其兄登尧及同村的赵学礼、赵全德结伴步行千里，到西安投奔了第16混成旅冯玉祥部，被分配到第1团第1营佟麟阁连当兵。1916

年，第16混成旅调到廊坊驻防，旅长冯玉祥发现赵登禹体格健壮，武艺高强，便调他到身边当了贴身卫兵。1918年，冯部在湖南常德一带驻防时，赵登禹与将士们打死了一只经常下山伤人的猛虎，在老虎咽气之前，赵登禹骑虎拍照留念，冯玉祥在照片上签名并题字：“民国七年的打虎将军”。

1921年，冯玉祥升任陆军第11师师长，奉命再度入陕，旋任陕西督事。冯知其上司陆建章曾受辱于土匪头子郭坚，一直想报此仇。一天，郭坚到西安，冯玉祥奉陕督阎相文之命，在西关军官学校设宴，准备在席间将郭除掉。不料，宴会开始后，埋伏者争相偷看冯郭对盏，竟将屏风挤倒。郭见势不妙，起身便走，众人没能挡住。赵登禹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把身壮力大的郭坚打倒在地，一枪将其击毙。从此，赵登禹更赢得冯玉祥的信任。

1922年，赵登禹下部队任排长，他剽悍善战，连获晋升，历任连长、营长、副团长等职。1927年，冯部改编为第2集团军，东出潼关，攻克河南，赵登禹一路战功显赫，又擢升为旅长。1928年，他任27师师长，转隶第4方面军宋哲元部。1929年，国民党军队缩编，回任28旅旅长。中原大战后，被张学良改编，任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侵占我国东北三省。1933年2月，日军越过山海关，大举侵犯热河，在3月4日攻占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中国驻军在此进行顽强的抵抗，长城抗战爆发。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尾追国民党撤退部队，向长城喜峰口逼近。赵登禹旅奉命从遵化经三屯营向喜峰口急进防堵。他们星

夜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旋即与日军交火。

赵登禹当晚赶到前线指挥战斗。在黑夜中，敌我双方犬牙交错，形成混战。长城垛口失而复得达20余次。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赵登禹腿部也中弹受伤。他包扎伤口后，在战地召开的营级干部会上提出当夜袭击日军的方案。他在会上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大家要保持我西北军的优良传统，为先我牺牲的官兵复仇！”会后，赵登禹亲率217团出潘家口，越过滦河，绕到日军的炮兵阵地。此时日军正在酣睡，29军用大刀猛砍猛杀，敌人野炮营的官兵死伤殆尽，又破坏敌炮18门，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远在上海的音乐家麦新听闻赵登禹的事迹深受鼓舞，以大刀队的事迹为原型创作了著名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从此，“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遍了全国，成为振奋民族精神、争取民族解放的号角。

喜峰口战役后，29军声名大振，赵登禹成为妇孺皆知的抗日英雄。长城战斗结束后，29军增编第132师，赵登禹任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35年8月，29军被调到北平附近的河北河间、大名一带驻防。

对于横行跋扈的日本侵略者，赵登禹一贯坚持针锋相对与之斗争。1936年夏天，几名日本特工绑架了第29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赵登禹与另两位师长冯治安和刘汝明商量后认为，日本实在太嚣张，一定不能向其示弱。于是，他们将一亲日分子叫来，赵登禹让其向日方传话：“限日本人两小

时以内好好把人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统统杀光！”说完，当着亲日分子的面，赵登禹操起电话向部队下令，要求两小时之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日本人被赵登禹的凛然之气所震慑，果然在两小时内就将宣介溪送了回来。

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7月下旬，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在北平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南苑战事告急。在河间、大名驻防的赵登禹部，奉军长宋哲元之命急驰北平南苑参加作战。7月27日，他率一个团到达距南苑两公里的团河时，遭到日军截击，双方展开激战，中国军队伤亡过半。赵登禹急率余部赶至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共同负责南苑防务。7月28日拂晓，日军第20师团以步兵3个联队、炮兵1个联队的兵力，在数十架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向南苑发起总攻。

南苑一带全是平原，无险可守，中国军队完全暴露在敌炮火之下，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29军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指挥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展开激烈厮杀。此时，赵登禹奉命率部撤至大红门一带防御，伺机反击。“中午时分，29军冲破敌人包围，进行转移。赵登禹命令骑兵部队先行撤离南苑，进入北平城内。他本人在南苑驻地乘一小轿车，前后各一辆卡车载卫兵向大红门转移。此情况被29军中的特务周思靖看得清楚，他马上用电话报告了日军。日军急调驻丰台牟田口部队第三大队先进攻

南苑西北角，后转至天罗庄(黄亭子)埋伏。12时50分，赵登禹之汽车、部队被炮火击中，赵登禹当场牺牲，大部分官兵壮烈殉国。日军从车中发现轿车内有一阵亡穿便服人，有29军书信文件，经受伤司机证言，遇难者为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

赵登禹将军的英勇壮举，连日军都不得不折服，日方保留的战时档案《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南苑附近战斗详报》和《天罗庄战斗经过详报》中，称赵登禹将军在此战中“名誉地战死”(即“光荣牺牲”之意)。28日下午6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北平红十字会，将烈士们的忠骸就地掩埋。后崇敬抗日英烈的北京龙泉寺老方丈，带领四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九年之久。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国府明令称，“陆军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陆军第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精娴武略，久领师干，前于北伐剿匪及喜峰口诸役，均能克敌制胜，懋著勋猷，此次在平应战，咸以捍卫国家保守疆土为职志，迭次冲锋，奋力无前，论其忠勇，洵足发扬士气，表率戎行，不幸深陷重围，死于战阵，追怀壮烈，痛悼良深！佟麟阁、赵登禹均着追赠为陆军上将。并交行政院转行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以彰忠烈，而励来兹。此令！”

赵登禹与同在南苑战斗中牺牲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最早战死疆场的两位高级将领，他们的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各

地都举行了悼念两位抗日英烈的活动。宋哲元得知赵登禹牺牲的消息，失声大哭，说：“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赵登禹的老上级冯玉祥得知他的死讯，更是悲痛不堪，挥笔写下了《吊佟赵》诗，以寄哀思。延安军民也为佟麟阁、赵登禹二将军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毛泽东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将北平通县古运河西岸的东大街更名为赵登禹大街，以示纪念。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公祭赵登禹仪式，在由李宗仁、冯玉祥等联名发出公祭文启中，对赵登禹作出了高度评价。之后，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到北平，将赵登禹和部分29军阵亡将士忠骸，迁葬于卢沟桥以东2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给赵登禹家属颁发了赵登禹为革命烈士证书。1980年重建赵登禹将军墓，墓碑正面镌刻着：“抗日烈士赵登禹将军之墓(1898—1937)”，其墓先后被列为丰台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市烈士纪念建筑物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1997年12月，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60周年，北京市大红门中学更名为北京市赵登禹中学，2003年4月与嘉园小学合并为北京市赵登禹学校。2009年9月，赵登禹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9月，赵登禹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三）中国航空事业的兴起

1. 中国第一个飞机场

南苑机场是中国第一个机场。作为中国开港最悠久的机场，它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见证了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航空事业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据姚俊《中国近代航空史》记载，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天津武备学堂数学教习华蘅芳就制成直径5尺（约1.7米）的气球，灌入自制的氢气成功飞起，这是中国人自制的第一个氢气球；澳洲华侨谢缙泰从1894年起开始研究飞艇，1899年完成“中国”号飞艇的设计。而关于飞机的起源，还要追溯1903年。这年年底，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飞行者一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试飞成功，标志人类开始进入航空器飞行时代。随后，欧美国家一些飞行家先后将飞机运到北京进行各类飞行表演活动。然而当时北京并无专用机场供飞机起降，只好将练兵操场、赛马场或者平整的空旷地改建。因南苑地势开阔平坦，还是清军演练校阅场，在这里进行飞行试验较为理想。所以，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为方便法国2架“高德隆”式小飞机来北京进行起降和飞行表演，在南苑毅军操场修建了简易的跑道。这是南苑成为飞机首次在中国土地上起降的见证。

清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从法国购进1架“桑麻”式飞机作为参观和仿制之用。清宣统三年（1911）三月，清政府驻英大使刘玉麟花6万银圆从英国购得飞机1架，由于无人会驾驶，只能将其停放在南苑机场充作展品。同年4月，由法国

学成归国的秦国镛驾驶从欧洲购买的“高德隆”式单座双翼飞机在南苑机场成功升空，并绕机场上空三圈降落。这是中国人首次驾机在中国本土飞上天空。1913年年年初，法国高德隆兄弟驾驶“高德隆”G-3型飞机，在南苑作了几次飞行表演。1917年3月，美国女飞行家凯瑟林·史汀生在北京南苑一次特殊的展示会上进行了飞行表演。这些航空飞行活动给清政府及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中国近代航空业的萌芽、创立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

有了飞机就要有飞行场所。否则，飞机就只能是一种摆设。清宣统二年二月，清王朝军谕府大臣载涛奉命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军事。回国后极力倡导发展航空事业，并在北京南苑五里店毅军驻地设立航空机关，试图自己研制飞机。同年，清政府批准毕业于英国伦敦纳生布敦工业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厉汝燕，进入英国布里斯托尔飞机制造厂和该厂自办的航空学校学习飞机生产工艺与驾驶技术。随后，清政府又从留学生中选派秦国镛、姚锡九、潘世忠、张绍程、鲍丙辰等人学习航空技术。他们成为中国首批接受正规航空教育和进行飞行培训的留学生。

按照军谕府的建议，清政府开始筹办飞机修造厂，试制飞机。1910年8月，军谕府拨款，在南苑五里店毅军练兵场内，修建供从法国购进的1架苏姆式飞机起降和设备维修使用的简易跑道，并筹设一支由摄政王载沣亲自统率的禁卫军航空队，选调军官练习飞行，开设飞机场，这是中国第一座机场——南苑机场得名之始。与

之相对应的是，美国最早的军用机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军用机场）修筑于1909年，而日本的首座军用机场则到了1911年才建成。由此可见，南苑机场的起步是相当早的。

1913年6月，北洋政府参谋本部第四局拨款6万银圆将南苑练兵场正式扩建为南苑机场。修建营地校舍100余间，停机棚、飞机修理厂各1个。同年8月北洋政府参谋总部在南苑创办了中国、也是亚洲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最早的航空工厂也在此成立。北洋政府后在南苑陆军营房以南、毅军练兵场以西建筑公用房、课堂、宿舍、校舍100余间，飞机棚2个和飞机修理厂1个，还有油库、弹药库、打铁房、翻砂厂、医疗所等，是我国最早形成的集飞机队、机场、航空学校和修理工厂于一体的航空基地。

1920年4月24日，第一条民用航线南苑至天津试航，1920年5月7日，北洋政府交通部开辟的北京—上海线京津航段的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开创了中国民航和航空邮件的首航，中国商业航空由此开端。之后，又陆续开通了一些国内民用航线，但因人力物力的限制与时局的混乱，这些花费不菲的航线多半是虎头蛇尾，无力维持。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十年间国内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商业航空运输蓬勃兴起，开通亚欧航线13条。

1936年，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部驻防南苑，修建了一个小型飞机场。七七事变后，南苑机场被侵华日军占领，成立南苑兵营，并将机场扩大成东西宽七八里，南北长十余里的大型军用机场。1941年日军在机场周边每隔一公里修建一

个大小不等的钢筋水泥结构飞机掩体，占地约1800平方米，各掩体之间筑有石子砂砾跑道，可以滑行。现今机场周边还遗留一些飞机窝，但大部分飞机窝后被改建成存放物品的仓库。抗日战争胜利后，南苑机场成为国民党的空军基地，转为军民合用，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此起降飞机。

1948年12月17日，南苑机场解放。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庄严的入城仪式，其主力部队是从南苑机场出发的。南京解放前夕，国共两党于1949年4月13日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至15日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当时国民政府和谈判代表团的飞机是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的。同年8月，人民解放军在南苑机场组建了第一个空军飞行中队，从此南苑机场完全归属空军管理。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当天，17架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穿过天安门上空，展示了银鹰展翅的威风。此后，新中国历次国庆阅兵的飞机编队都是从此起飞。

南苑机场由于跑道长、安全环境好，因此也是迎送外宾的重要机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见证了我国早期的重要外交活动。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南苑机场成为苏联图-104喷气式客机首次降落的中国机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南苑机场迎接。同年12月，越南原国家主席胡志明访问中国，朱德副主席亲自前往南苑机场迎接。20世纪60年代末起，美苏争霸态势改变，中国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新力量，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两国关系实现和解提供了现

实基础。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特使秘密访华，商谈中美建交事宜，其专机就是从巴基斯坦飞越喜马拉雅山降落在南苑机场的。

1987年9月24日，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随美国空军部长奥尔德里奇访问中国，首次在中国进行了精彩的飞行表演。1991年2月中苏双方签订引进苏-27战斗机的协议后，苏联空军访华，在北京南苑机场进行了飞行表演和地面静态展示，其中包括米格-29、苏-27、安-72、苏-25等，都是当时苏联空军压箱底的先进装备。2003年11月3日，驻京部队官兵及首都各界群众约11000人，在南苑机场参加纪念载人飞机试飞成功100周年飞行、跳伞表演活动。此次担任飞行表演任务的是有着“蓝天仪仗队”之称的“八一”飞行表演队。该队与美国“雷鸟”、英国“蓝箭”、法国“巡逻兵”、日本“蓝色冲击波”齐名，能飞各种高难度动作，并且是世界上惟一一支保持特技表演成功率百分之百的飞行队²。2004年是中法文化年，当年10月，法国空军“法克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抵达南苑机场，与空军“八一”跳伞队联合献艺。

1984年，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南苑机场成为中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基地，自此南苑机场对民航开放，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南苑机场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不断提升，基本适应各种现代化运输机型起降的保障需要。然而随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于2019年9月25日开始通航，中国联航也转场至大兴国际机场，南苑机场作

² 参见2003年11月04日 人民网-京华时报《北京蓝天首现特技飞行 纪念载人飞机百年(组图)》一文。

为民用机场的使命也将终结。

南苑机场作为中国航空事业的肇始之地，已有100余年的历史，见证了中国航空近代化、现代化的发展史，在我国航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军用机场也显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空军的发展脉络，对我国军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

2018年9月1日，是中国空军航空开放日。这一天，让世界见证了中国空军力量的发展和崛起。不过，在100多年前，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却让人感慨颇多。早在1910年，清政府就拨款在北京南苑修建了供飞机起降的简易跑道，并修建了建筑厂棚。1913年9月，北洋政府在南苑创建了航空学校，这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

1913年3月，袁世凯在总统府顾问、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白理素的建议下，决定将航空学校建在南苑，定名为南苑航空学校，筹办工作由参谋本部负责。同时，调集孙中山在南京组建的陆军第三师交通团飞行营归并入驻南苑的陆军第三师，附设随营航空教练班和修理厂。这一交通团飞行营，是中国第一支有正规建制和番号的飞机队，组建于1912年6月，共有奥地利制“艾垂奇”鸽式飞机两架。飞行队归入南苑航校后，他们先在南苑陆军营地建校舍100余间，停机棚和修理厂各1个，该修理厂由清政府的飞机试行工场改建，并把附近的陆军练兵操场扩辟为正式飞行场，作为练习飞行的起降场地。财政部拨款30万银圆，从法国购进“高德隆”教练

机12架。该型飞机的结构比较简单，最高飞行时速96公里，在地面滑行100米左右即可起飞。

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经过5个月的筹建和准备，1913年8月，正式建成。这所航校隶属于参谋本部，以培养驾驶和制造飞机的航空人才为目标，校址位于毅军练兵场以西、营盘以南。参谋部委派秦国镛为南苑航空学校的首任校长。秦国镛是在法国学习飞行的留学生，是第一位在中国领空驾机飞行的中国人。教育长王鹗，主任教官为留英学生厉汝燕，飞行教官由留法学生潘世忠和法国飞行师康斯坦丁、欧伯尔担任，潘世忠任修理厂厂长。此外，还从山东和河南的兵工厂以及北京南口火车修理厂挑选了数十名技术优秀工人技师，经法国工程师指导培训后，承担飞机的机务维护工作。南苑航校是亚洲第一所航空学校，它比日本早了三年。尽管当时的中国，饱受列强势力的欺凌，经济凋敝、人民困苦、国际地位低下。但第一代中国航空人不甘落后，勇于投身航空飞行的精神，是值得人们尊敬的。

1913年9月初，南苑航空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期学员，招收对象是陆、海军军事机关和作战部队中年龄在25—30岁少校军衔以下的军佐。选拔学员要经过三道手续：先由保送的军事机关、部队进行初步挑选，然后由航校对推荐的人员进行体格检查，合格者方可参加学科考试，以考试成绩择优录取。9月底，第一期50名学员入校报到。学员在校期间待遇比较优厚，除照发原薪外，另供给伙食、医疗等费用及数额不菲的津贴。课程分为学科、术科两大类，学科设有航空学、机械学、气象学、陆军

战术与战史、外语等课程；术科以练习飞行为主，装卸发动机和修理发动机为辅。学制第1期为1年，从第2期开始改为2年，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高级班分为轰炸、侦察、驱逐三个组别。当时距飞机的发明仅有十来年的时间，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航空事业的发展也尚处起步阶段。飞机的性能及质量要求还是较为原始的，还不能同现在的伊尔、米格、波音等机型相比。

学校从法国购置的12架法制“高德隆”教练机中只有3架为双座舱飞机，其余的都是单座舱飞机，而双座舱飞机的前后之间又没有配备双操纵装置，坐在后面的学员只能当作乘客体会飞行的感觉，无法通过教员带飞提高自身的实际操作技能，航校飞行训练效率较为低下。

1914年12月，第一期学员学习完毕，除9名被淘汰外，其余41人全部领到合格证。由于北洋政府财政枯竭、无力再建空军，毕业学员无处分配，于是临时决定：凡自愿留校候差者，准予留校，待遇仍旧；不愿留校而自愿另谋职业者听便；愿回原机关、部队任职者，由参谋本部送回原机关、部队任用。

航校第2期学员于1915年3月入学到1917年3月42名学员毕业。航校第一、二期共培养了83名飞行人才。袁世凯称帝复辟倒台后，北洋政府相继由直系的冯国璋、皖系的段祺瑞所控制，航空学校继续开办。

1919年11月，南苑航空学校脱离参谋本部改隶国务院旗下新成立的航空事务处，段祺瑞将其更名为“航空教练所”。自1921年春招收第三期学员开始航空教练，所使用的教练机改为可由教员带飞的英制“爱弗罗”型双座教练机，并聘请了

英国飞行教官和航空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但从1920年2月至1923年5月的三年多时间里，航空教练所五易所长，聘用的外籍教官也经常不到现场授课，升空训练时常中断，训练期限一再延长，第三期学员因此直到1923年夏才毕业。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任大总统后，特派赵玉珂担任航空署督办，同时将航空教练所更名为“国立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同年11月，第四期学员入校。这批学员除从陆、海军军官中选拔外，其余均为普通中学生。第四期学员共有35名，1925年11月毕业，他们成为南苑航空学校最后一期正规毕业生。因为各地军阀连年混战，教职工的薪金都难以发放，航校已经无力继续招生。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曾将南苑航校约20架飞机连同器材运往东北老家，致使南苑航空学校无法正常运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南苑航空学校修理厂还承担着飞机研制任务。1913年10月20日，在校长秦国镛等人的领导下，由南苑航校修理厂厂长潘世忠主持研制各种类型的飞机。他们参考“高德隆”及“法曼”飞机，于1914年自行设计研制，并由潘世忠亲自驾驶的飞机，从南苑机场飞上了天空。这是中国人在本土自制飞机成功的最早记录。这架标号为“I”的飞机便成了中国人在本土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飞机。该机采用推进式螺旋桨方案，动力采用汉阳兵工厂仿制的法国“格莱姆”80马力发动机，机首装有一挺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机枪，该机机身标有“I”字标号，因此被称为“枪车”。同年，航校飞行教官厉汝燕也研制出一架水面上起落的飞机，但一直没有试飞。

南苑航校创办后至撤销前，先后多次配合陆军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913年冬，蒙古叛军先后攻占了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北部、多伦和张家口以北的广大地区。北洋政府调张家口驻军卢永祥部第10师征讨，同时命参谋本部派飞机前往协助。南苑航空学校奉命指派修理厂厂长潘世忠、航校学员吴经文驾驶“高德隆”式双翼教练机随军参战，主要是进行空中侦察，为地面部队提供叛军情报。这是中国利用飞机进行空中侦察之始。

1914年4月6日，由潘世忠等驾驶1架“高德隆”式飞机飞往河南，随北洋政府段祺瑞军围剿宝丰白朗农民起义军。后由南苑航空学校组成飞机大队，由校长秦国镛任大队长率章斌、关庚泉、厉汝燕等驾驶4架飞机赴陕西各地实施侦察、轰炸。这是中国战争史上首次空中轰炸作战行动。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帝制，遭到全国反对。同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讨袁。袁世凯为了防止护国军北上，在派陆军加强川湘兵力的同时，指令南苑航空学校组成两支航空队参加对护国军的作战，每队配备2架“高德隆”式教练机。参战飞机主要进行空中侦察任务。后袁毙命，飞机返校归建。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立逊帝溥仪复辟，5日，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即致电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声言“率飞行人员与讨逆军各部取一致行动”。当时南苑空军在讨逆行动中一共出动了7次，7日上午派飞机直接飞到天安门上空散发传单，在紫禁城内投下三枚小炸弹（实际上是手榴弹），以示警告。轰炸后的第二天，溥

仪宣布退位，张勋复辟失败。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半，山东孙美瑶率众匪在津浦临城（今山东薛城）至沙沟车站之间拦截一列火车，将其中27名外籍旅客劫持。美国人罗斯因反抗被当场杀死，其他人被劫往抱犊崮，以谋取赎金。史称“临城劫案”。北洋政府命山东督军田中玉采取“以剿促抚”的办法，派兵包围抱犊崮，双方多次谈判未果。26日，应田中玉请求，北洋政府任命南苑航空学校蒋逵为临城剿匪航空队队长，并率2架“阿费罗”式飞机飞往临城。同时，命令保定航空司令部也派机前往。飞机在抱犊崮上空作威慑性飞行，并散发传单。迫于压力，6月2日孙美瑶与官方恢复谈判，并接受招抚，释放人质。

1924年秋，直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指使江苏督军齐燮元、福建督军孙传芳进攻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史称“江浙战争”亦称“齐卢战争”。直系北洋政府令南苑航空学校组成中央临时航空队，由蒋逵任队长，率4架“维梅”式飞机，赴江苏协助齐燮元作战。中央临时航空队与江苏航空队组成统一指挥部，联合对卢军阵地进行侦察、轰炸，10月12日，卢部因腹背受敌，军无斗志，宣布下野，出走日本。

民国初期，南苑航空学校所参与的军事行动，既有平叛肃匪的正义行动，也有参与军阀混战、镇压农民起义的不义行为。总之，当时的航校为北洋中央政府马首是瞻，通过一系列参战行动，也锻炼了队伍，发挥了航空学校的作用，这对中国航空事业以及中国空军的成长，在客观上是有帮助作用的。

1928年5月，北洋政府垮台，南苑航空学校终被撤销，所有航空机构及人员、飞机被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从1913年9月至1928年5月，南苑航空学校办校近15年，累计招生四期，159名学员学成毕业，加上8名还未毕业即被各地军阀提前聘用的学员，共培养了167名飞行人员。这些学员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和各省组建航空队的骨干，也成为组建国民政府空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苑机场延续传统，在此建立了航校及空军培训机构。1949年12月1日空军第四驱逐机航校在南苑机场成立，12月24日，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航空学校。1953年2月19日，为培训大队长以上飞行指挥干部，在南苑机场组建空军中级指挥员训练班，隶属军委空军建制。同年3月改称为空军指挥员训练班，其后的十几年间先后更名为空军高级航空学校、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1968年9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改编为歼击飞行航校，其校部机构，由军级改为师级机构，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航空学校，归北京军区空军建制领导。1969年10月29日，中央军委决定该校迁至山东济南，原驻沙河机场的航空兵第34师102团进驻南苑机场，并组建空军南苑场站。之后各项保障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并快速健康发展。

3. 中国民航从南苑起步

南苑机场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军用机场，而且中国民用航空事业也是从这里起步的。

1919年1月，北洋政府交通部成立“筹办航空事宜处”。此后又从英国、法国、

美国购买了爱佛罗、高德隆、道济等型号飞机 100 多架，准备用于民用航空。1920 年 4 月 24 日第一条民用航线南苑至天津试航，中国民航事业由此开始。1920 年 5 月 7 日，北洋政府交通部开辟的北京—上海线京津航段的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开启中国民航和航空邮件的首航，中国商业航空由此开端。1921 年 7 月 1 日，北洋政府开设北京至济南航线，中国航空邮政正式创办。后因时局多变，班机不能按时往来，遂于同月 10 日停航。同年 8 月开辟南苑至北戴河旅游航班，每周五下午 3 时由南苑起飞，飞行 2 个多小时，在北戴河赤土山机场降落，周六、周日在北戴河飞行游览海滨和长城，周一返回北京，形成一条重要的旅游航空专线。此线运行 3 年，至 1924 年停办。

民航事业虽然开启，但在北洋军阀的昏暗统治下，民用航空不可能健康有序地发展。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以及时局的混乱，这些花费不菲的航线多半是虎头蛇尾，无力维持。直到北洋军阀灭亡时，民航所发挥的作用也并不大，有的航线刚刚开启，就中途搁浅。

1927 年 4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 年，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北伐，同年 6 月占领北京，并改北京为北平。在此期间，张作霖逃回东北，结果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在皇姑屯。此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改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国民党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国民政府在执政初期，力图有所作为，因此对航空事业比较重视。

南苑机场是当时北平最大的机场，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的航班都在南苑机场起降，它们共同开辟了经停北平的

13 条航线。

中国航空公司是交通部与美国柯蒂斯·赖特飞机公司合资成立的航空公司，拥有沪蓉、京（南京）平（北平）、沪粤三大干线的飞航特权。京平航线为“中航”经营的第二条航线，此航线由南京起飞，经徐州、济南、天津至北平，于 1931 年 4 月开始试飞后，因航线与津浦铁路线平行，客货源比较清淡，亏蚀颇多，到 12 月即告停航。翌年 6 月，“中航”将京平航线改为上海至天津航线。后决定在南段由上海起飞后，绕道南京再到海州（今连云港市），北段则由天津延伸到北平，改称沪平航线，每星期上海和北平对飞各 3 次。

欧亚航空公司是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营的，1931 年 2 月创办。主要经营 3 条航线：第一条从上海经南京、天津、北平、满洲里，经苏联亚洲城市至欧洲；第二条从上海经南京、天津、北平及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亚洲城市至欧洲；第三条从上海经南京、甘肃、新疆之中国边境，经苏联亚洲城市至欧洲。

然而，当时苏联政府担心德国会利用“欧亚”飞机进行军事侦察，因此不同意欧亚航空公司的航班飞越苏联。经过交涉，苏联提出一个变通办法，即“欧亚”可将邮件、旅客运载到满洲里，然后改由铁路运输到苏联的亚洲城市伊尔库茨克，再由苏联民航飞机运往莫斯科，衔接德国“汉莎”航班转运欧洲各国。其他两条航线亦可照此办法。于是，“欧亚”在 1931 年 5 月 31 日先开通上海至满洲里航线，自上海起飞，经南京、济南、北平、林西到达满洲里，全程总长 2350 公里。至 6 月底，此航线运载邮件收入 2350 余元、客票收入 6600 元，

乘客 25 人次，实际飞行仅 8 次，亏损 24.7 万余元。

七七事变后，南苑机场被侵华日军占领。抗日战争胜利后，南苑机场成为国民党的空军基地。因战时陆续聚集到西南大后方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军队人员，以及避难者等数百万人员，此时都面临着东归的需要，这对国家交通运输分流功能提出了严峻挑战。由于持久战争的破坏，其他交通工具滞缓且缺乏，航空运输首当重任。中航、央航抓住这一契机，急速发展壮大。

中航依靠在抗战后期执行“驼峰飞行”任务积累起来的技术、物资和人才力量，全力配合“还都复员”运输，展现了航空运输的优越性，成为复员运输的主力。在抗战胜利后 6 个月内恢复了原经营的航线，增辟 15 条航线。1946 年开通了北平—太原航线，1947 年增辟北平—沈阳航线，1948 年又开辟北平—宁夏—兰州航线等。至 1948 年底，航线总长 52389 公里，中航的飞航里程达到极值，运输总周转量在国际民航运输协会排名升至第 8 位。1945 年，央航增辟沪昆、沪渝、沪平等 3 条航线，航线总长 5258 公里，尽最大努力先后恢复上海、广州、北平、柳州等航站楼的工作。复员运输期间，央航承运乘客 1.67 万人次，货物 1690 余吨。

新中国成立后，南苑机场完全归属人民空军管理，基本上作为军用。1984 年，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与 22 个省、市及大型企业联合组建民用航空公司，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就此诞生，南苑机场随即成为联航的基地。当时的中国联航有 40 余架飞机，型号除波音

767、波音 737 外，还有俄制的图-154 和伊尔-76 等飞机。2002 年 10 月 31 日，一架从银川飞往北京的民航飞机降落之后，中国联航迎来了为期近三年的停航（民航业务停航，但仍承担空军指派的飞行任务）。2004 年中国联航实现“军转民”，由上海航空和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共同出资，中国联航重新组建，继续以南苑机场为基地，并于 2005 年 10 月完成新航。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南苑机场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不断提升，基本适应各种现代化运输机型起降的保障需要。自 2005 年中国联航进驻以来，航班数量不断增加，至 2011 年南苑机场已成为年吞吐量为 300 万人次的军民合用机场，列全国机场第 41 位。2011 年 5 月，南苑机场实施改扩建工程，主跑道沥青盖被大修（2800 米），机场设有完整配套的停机坪、客机坪、滑行道、联络道、进场公路等设施，以及较为完备的飞行指挥、引导、通信和后勤保障装备、设备，可满足 600 万人次年吞吐量。随着中国联航业务的不断拓展，到 2018 年南苑机场年吞吐量达 650 万人次。

尽管如此，南苑机场的年吞吐量还不到首都国际机场的 6.5%（2018 年首都国际机场突破一亿人次）。同时，也凸显了南苑机场离市中心过近的缺点，极大地限制了北京南城的发展。2012 年 12 月，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与河北廊坊交界处建设北京第二座国际机场，即大兴国际机场。

2019 年 9 月 25 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举行投运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同日晚 23 点 21 分，南苑机场最后一架航班起飞。

随着机场跑道灯的熄灭，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机场——南苑机场，正式结束民用机场的使命。这座运营超过一百多年的机场，是中国航空发展史的见证者，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回味。

4. 人民空军第一支空中作战分队

“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这是1955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勋代表大会上，给人民空军的题词。人民空军自1949年成立，走过了70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人民空军的成长与壮大。

人民空军第一支空中作战分队的源头要追溯到抗战胜利后。那时，党中央在东北利用接收和搜集到的敌伪航空器材，创建了自己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从1946年3月成立到1949年7月，共培养各类航空技术人员560名，为建立人民空军准备了骨干。1948年12月17日，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7师21团占领南苑机场，缴获飞机10架。其中，包括B-24轰炸机1架，B-25轰炸机1架，蚊式轰炸机2架，P-51战斗机3架，C-46飞机1架，C-47运输机1架，AT-6小型运输机1架，另外缴获大量航空器材和发动机，这为日后人民空军的组建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建立空军的事宜被提上日程。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召见了主持东北航校工作的常乾坤和王弼同志，听取了他们对航校工作的汇报。事后，根据常、王两人的建议，决定成立军委航

空局，统一领导和管理人民解放军的航空工作。3月30日，军委航空局正式成立。遵照中央的指示，立即开始着手接管国民党航空器材、人员以及建立人民空军工作，先后组建了华北、中南、华东等军区司令部航空处。

1949年5月4日，正当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南下之际，盘踞在青岛的国民党空军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对北平南苑机场进行了轰炸。共投弹30枚，炸毁2架通讯联络机，炸伤C-46、B-25飞机各1架，炸毁机库1座、房屋196间，还死伤24人，使解放不久的北平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党中央正在北平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了确保第一届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党中央决定建立一支空中防空力量，以对付敌机可能的袭击，保证北平地区的安全。1949年5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召见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和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方华，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一个飞行队的决定，确定从东北老航校和各军区航空处抽调飞行员十多人，飞机十余架，主要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必要时协助陆、海军部队解放长山列岛。遵照党中央指示，1949年8月15日，华北航空处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中国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空中铁拳。飞行队当时驻在北平的南苑机场，所以习惯上称之为“南苑飞行队”或“北平飞行队”。由于装备有不同种类的飞机，有的又称为“混合中队”或“混合大队”。

飞行队作战指挥和飞行训练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华北军区航空处具体指

挥。下辖2个战斗机分队，1个轰炸机分队和1个地勤分队。最初共有飞机10架，其中P-51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架，PT-19型教练机2架，这些大部分是从南苑机场缴获的。为了加强飞行中队的力量，不久军委航空局又从东北航校抽调来了13名飞行员和19架飞机（其中P-51战斗机17架，蚊式和B-25型轰炸机各1架）。同年10月，飞行中队又增编了一个空运分队，成为第4分队，有C-46型运输机2架，C-47运输机1架。初期，飞行队只有五六十人，以后扩展到一百五六十人。

飞行队的飞行服原来是日本式的连身服，后来改成夹克式，沿用至今。飞机上的机徽最初是由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设计的，原来设计为有“八一”的红五角星，后来为了在空中与苏军飞机区分，又在红五角星左右两边各添上一条横道，表示飞机展翅的样子，这个机徽也一直沿用至今。

南苑飞行中队组建以后，经过短期训练，即于1949年9月5日起开始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值班任务。每昼夜在南苑机场保持2—4架飞机战斗值班，一声令下，即可升空作战，成为人民空军建立前，最早担负作战值班任务的飞行部队。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为了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每天拂晓，飞行中队都要有10多架战斗机进行试车检查。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不仅对敌人起到了震慑作用，而且对刚刚获得解放的人民来说也是一种极大地鼓舞。

1949年9月上旬，南苑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接受任务以后，飞行中队迅速制定了具体而详细

的计划，空地勤人员按照上级的部署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之中。参加受阅的飞机共17架，其中P-51战斗机9架，蚊式战斗轰炸机2架，C-46运输机3架，PT-19教练机2架，L-5通讯联络机1架。飞行队以3架P-51战斗机编成1个分队，形成共3个分队的“品”字队形。第4分队是2架蚊式轰炸机编成“一”字队形。第5分队以3架C-46运输机呈“品”字队形。第6分队以2架L-5作长机，2架PT-19作左右僚机，也编成“品”字队形。这样，17架飞机形成一个跟进队形通过天安门上空。

1949年10月1日，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这一天，新中国举行了开国大典。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面对天安门广场上汇集的30万群众，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下午4时，阅兵式开始。受阅飞机从南苑机场依次起飞，按计划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出航，在通县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

为了防止受阅时敌人的袭扰，部分飞机还装实弹飞行。据当时的空中总领队邢海帆回忆：“下午4时35分，我耳机里传来了空中受阅开始的命令，即率领一飞行编队以双桥广播天线铁塔为出发检查起点，直飞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检阅。随后，又按原定方案率一、二、三分队P-51型战斗机9架，右转弯，绕北城墙飞行，正好衔接在第六分队教练机后面，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然后左转弯到南苑机场着陆。”这就是开国大典时在天空中飞行的是17架飞机，而地面观看到的是26架飞机的缘故。这次空中受阅，充分

展示了银鹰展翅的风采，让世界见证了人民空军的诞生。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萧华任空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军委航空局宣布撤销。

随着全国的基本解放，北京受敌机空中威胁日益减少。为了适应空军大办航校，加速培养新飞行员的需要，1950年初，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决定对飞行中队进行调整，将轰炸机分队的飞行员、飞机及部分战斗机分队的飞行员和飞机调往新办的航校，运输机分队由于空运任务的不断增多，单独组成了一个空运队。至此，飞行中队被压缩成了两个战斗机分队。

1950年7月26日，中央军委命令将飞行队的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一驱逐大队”，下辖2个飞行中队，1个机械中队。1950年11月，苏联根据与中国政府的协议，派遣米格9式喷气式战斗机师到达北京，驻南苑机场，担负北京地区的防空任务，使首都的防空更有保障。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11月19日，“空军独立第一驱逐大队”正式撤销，其人员和作战的飞机分别调往各航校和航空兵部队。至此，第一支能胜任防空作战任务的飞行部队，完成了自己的光荣历史重任，载入我军史册。

（四）南中轴从这里腾飞

1. “浙江村”治理与大红门服装商贸区的形成发展

提起北京的“浙江村”，在上世纪90年代曾名噪一时，闻名全国，也让很多丰

台人记忆犹深。“浙江村”在什么地方呢？它位于距天安门仅有五公里之遥的丰台区大红门地区。

大红门原指明清两朝京城最大的皇家苑囿南苑的正门。鸦片战争后，昔日的皇家园林走向荒芜。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这里的经济依旧以农业为主，主要从事粮食和蔬菜生产，保持着农村、田野的风貌，虽然紧邻北京南城，但城市发展仍然缓慢。

“浙江村”的称呼始于1988年，它并不是行政区划的概念，而是指由温州等地进京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在北京城南自发形成的一个移民聚落。主要分布在从天安门往南延伸的中轴线两侧，北面是南三环路，南至大红门东西街、北天津庄、大里窑等地，西起草桥，东到分钟寺。集中分布于高庄、海户屯、海慧寺、东罗园、邓村、后村、马村、时村、石榴庄、果园、马家堡、洋桥等村落。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红门一带只有10来户浙江人，1983年和1984年急剧增加达千人，1985年初具规模，形成聚落群体，到1989年已达3万人之多。“浙江村”是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迫于温州人多地少、工业不发达的客观基础，得益于温州经商的历史传统影响，经过坎坷形成的。最早到北京办实业的，是乐清裁缝师，他们是“浙江村”第一批定居者。

1983年，在内蒙古包头做服装生意的温州乐清人卢毕泽到北京进布料，发现首都北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拒人千里之外，大街小巷有不少敞着嗓子叫卖短裤袜子、针头线脑之类的商贩，而且买的人不少。卢毕泽在海户屯33号安顿下来之后，迅速拉开了架势，18平方米的地方既是卧室也

是车间，放了三台缝纫机、一台锁边机、两张烫衣板，开起了一家专门生产“时髦的温州服装”的小作坊。那时市场上货品短缺，不管你服装样子做得如何，只要质量过得去，就一定有销路。仅仅一年多，卢毕泽的生意已经初具规模，产品供不应求，他请了几个工人帮忙加工，也不需要他自己扛着大包上街卖裤子了，把做好的裤子拿出去给别人做代销，或者批发给老乡卖。很快，乐清人在北京做服装成了“万元户”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温州老乡闻风而来。

最初一批“浙江村”的经营户有不少摆地摊的经历，有的经营户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驮着一大包衣服出去摆地摊，东单、西单是常去的地方，大街上不敢摆，就钻进一条条胡同叫卖。1986年，中国轻工总会陆续接到一些城市的投诉，称市场上的羊毛衫价格被一些温州人垄断。前门、王府井等繁华商业街大大小小的商场里也出现一些温州人，向商场经理提出承包柜台的要求。

1986年后普遍出现的“包柜台”，对于“浙江村”初具规模具有决定性意义，使“浙江村”的产品开始占据城市核心商业领域。与摆地摊相比，包租柜台在货品的承载量和流通量上都要远远高于前者，原先靠“自产自销”为主的供应链出现了断裂，产量跟不上销量，于是一种新型的经营关系——服装代销出现了。代销的出现，促进了“浙江村”的两大改变。一是专业化分工开始出现，产销分离，原先自产自销的形式被更大范围的分工、协作所代替，“浙江村”内部经济网络开始形成；二是对市场的关注度和敏感度大大提高，

什么面料的衣服好卖，哪种款式最流行，这些信息都源源不断地由经销商及时反馈给生产者。

1992年，借市场经济大潮，“浙江村”的规模也由此迅速膨胀。据1994年10月丰台区的统计显示，该地有外地常住及流动人口11万人，而本地农民仅有1.4万余人。这些人主要来自浙江省温州市，其中乐清人约占70%，永嘉人约占25%。这些流动人口95%属于农业户口，从农村出来；只有5%的人直接来自城镇。聚居在“浙江村”的流动人口主要是有一定经济实力，在北京做服装生产批发、五金电器、小商品市场、窗帘布艺等轻工业生意的经营者；或是从事各种职业的农民工；或是没有职业的游民。

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的大量涌入，在繁荣经济的同时，也导致大红门地区产生了大量违法建设，并带来复杂的社会管理难题。“浙江村”自发蔓延开后，当地农民见缝插针，纷纷盖房出租，甚至连海慧寺路上的两个公厕都被填了盖出租房。一些地方的房子盖到马路上，把原先路边的电线杆也包了进去。1992年以后，“浙江村”里又兴起了大院热，一些温州老板向村级组织租地，盖起平房，形成一个个居住大院。到1995年11月，“浙江村”里已经有46个大院，仅马村就出让了202亩地，形成颇有规模的居住区和外地人居住群落。“浙江村”的治安、环境卫生和交通状况逐步恶化，安全隐患日益增多。

由于公共服务设施的压力和社会治安等社会问题，区、街、乡曾对“浙江村”进行多次整治，1989年和1990年进行的两次大规模行动使整个“浙江村”几乎被

清理一空，“浙江村”处于低谷。但温州个体工商户经过在全国的摸索，终于发现和拥有了北京这个有巨大潜力的市场，不会轻易放弃。对轰堵清理采取了迂回的“游击”手段，“清东躲西，清南躲北”，实在迫不得已，就转向石景山、长辛店等较远的郊区，或暂时退往北京周围的河北等地，一旦风头过去，就纷纷返回原地，再度开张。因此清理效果是暂时的，每次清理之后不久，“浙江村”人数不仅没减少，反而不断增加。“浙江村”内的北京人都愿意将房屋留着供“浙江村”居民返回时租用。

从1992年起，北京市政府综合实际情况改变了过去那种“以轰为主”的清理政策，开始探索“以管为主”的管理办法。1992年2月，按照市领导的指示，丰台区在大红门地区成立了“外地来京务工经商暂住人员联合管理办公室”，有100多名工作人员对出租房、户籍、治安、经营、税收、劳动用工等分别实施管理，对市容环境进行突击整治，初步取得效果。

为了改善经营业态，丰台区工商局与温州驻京办事处协商，并与温州市工商局取得联系，通过双方交流，1992年底达成了建设专业批发市场的共识，丰台方面出资1000万，温州方面出资1200万，向经营户集资1500万。市场的名字叫做京温，表示是北京和温州合作共建的。1994年，首都第一家大型专业服装批发市场——京温服装批发中心建成使用。它的建成，标志着大红门地区的商业环境发生了一次重大升级，原先粗放散乱的集贸市场形式逐步让位于精细规范的现代商业形态。它使区域内的市场走上规模化发展的道路，为之后大红门地区的区域改造和产业升级指

明了方向。然而，当时仅一家服装批发中心尚不足以满足数以万计的服装经营者的需求。由于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数量远远超出当地公共设施的承载能力，且形成越聚越多的趋势，从而造成“浙江村”的环境日益恶化。据统计，聚居在东罗园、果园、大红门、时村和石榴庄5个行政村里的11万外地人，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75平方米，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安全隐患随处可见。交通秩序极为混乱，当时人们来到“浙江村”，经常见到拉货的汽车、三轮车横冲直撞，道路拥堵不堪，噪音扰民现象严重，当地群众苦不堪言。治安状况明显恶化，到1994年至1995年间达到极致，仅1995年1—9月份，就发生刑事案件1543件，比1994年同期上升99.6%，近乎翻番，1995年6月平均每天发生的案件就达7.76件。可以说，“浙江村”已经成了令人头疼的乱象丛生之地，不进行大规模综合整治是难以改变状况的。

1995年9月25日，国务院针对丰台区大红门地区的问题作出批示：“北京‘浙江村’这种失控现象不能任其发展下去，否则对首都安全必带来严重后果。”北京市委、市政府立即提出清理整顿大红门地区的具体要求，丰台区委、区政府迅速制定《关于大红门地区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清理整顿的实施方案》。随后，区委、区政府专门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从全区抽调4700余人组成工作队，依据保护合法、取缔非法、打击犯罪的原则，在前期分组进村入户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于当年11月初开始对大红门地区进行全面清理整顿。经过一个多月紧张而艰苦的工作，将分布于该地区时村、

大红门等村的 3600 余间严重侵街占道违章建筑和外地人非法建设的 40 余个大院、6290 间违章房屋全部拆完清光，劝离流动人口 5000 余名；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查处各类违法犯罪分子 157 名，破获刑事案件 14 起；同时对京温服装大厦等 6000 多个服装摊点依法予以保护，将合法的出租房屋和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纳入有序管理，建立健全日常监管制度，并进一步整修拓宽了大红门北路。

1995 年 12 月，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大红门地区清理整顿小组召开会议，研究在大红门地区建设大型服装城的规划工作。规划建设的大红门服装城分 3 期建设，包括交易市场、公寓式住宅、中低档旅店以及饮食、娱乐等配套设施。力求通过服装城建设，彻底改变大红门地区的现状，形成一个“环境优美、秩序良好、生活方便、经济繁荣”的大型服装集散市场。依据“控制规模、严格管理、加强服务、依法保护”方针，丰台区从 1997 年起采取多种措施抓好基层规范化管理，特别是 1999 年和 2000 年，区主要领导亲自担任外管领导小组组长，连续出台 16 个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规章，提出严密组织、严格纪律、严格制度、严格程序、严格管理、严格执法、严厉打击“七严”措施，使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工作进一步走向规范和有序。1999 年经先期试点在全市率先建立 354 个居（家）村委会外来人口管理站，聘任 1487 名外管协管员，经过培训上岗后履行“填写三张单（暂住通知三联单、准予入住通知单、检查报告单），把好两道关（出租房屋审批关、流动人口暂住关），对流动人口实行面对面管理”职责，做好“把两关、抓检查、

搞服务、建联保、收税费、集资料”六个方面工作。以外管站为载体，强化基层管理组织和管理工作，实现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工作由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突击式管理向日常性管理、职能部门单一管理向齐抓共管格局“三个转变”。

1996 年 5 月，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举行了奠基仪式，1998 年 2 月落成开业。开业之初，便吸引了全国众多服装生产企业、知名品牌和商家入驻。到 21 世纪初，短短十几年间，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就发展成为以经营高、中、低档各类服装、鞋帽和小百货等为主的大型专业批发兼零售市场。日客流量达数万人，日货运吞吐量达千余吨，批发销售辐射面遍及全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并远销俄罗斯、乌克兰、朝鲜、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在随后的几年里，北京南苑路形成了一条 2 公里长的服装商业街。随着北京新世纪服装商贸城等 20 多个大型服装批发交易市场的相继建成使用，一座座高楼鳞次栉比，各式各样的服装广告牌林立其间，散发着大都市浓郁的时尚气息。大红门商圈的正式成型，有力带动了北京城南区域的发展。

2002 年，区委区政府提出“一五五”发展战略，确定打造大红门特色商业街的发展思路，并推出木樨园购物广场、鑫福海大厦等 8 项重点建设项目。在 2006 年丰台区“十一五”规划纲要中，进一步将大红门服装商贸区定位于南中轴路两侧，区域面积约 5 平方公里。2006 年大红门区域已建成项目有京温大厦、大红门服装城、福成布艺大厦等 23 家大型服装服饰、布艺面料批发市场，营业规模 58 万平方米；正在推进的项目有北京国际轻纺城、木樨园

购物广场、鑫福海大厦等6项工程，规划建设规模达到260万平方米。大红门服装商贸区年交易额超过30亿元，达到全市同类商品交易额的54.5%。

为了提升大红门服装市场的竞争力，丰台区引入服装商业核心区（CBC）的概念。服装商业核心区是以服装产业为灵魂，结合相关配套产业（物流、贸易、教育、营销服务等）形成的特色商业区域。服装商业核心区对其辐射领域内的服装文化、服装商业模式等的发展具备一定的影响力。2007年10月，“北京大红门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该中心占地面积39960平方米，建筑面积24000平方米，与北京著名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区服装贸易核心区隔路相望。中心拥有可容纳1000人的设施先进的展览大厅，可以举办大中型演出、展览展示、新闻发布会等活动。2008年3月，由北京大红门服装协会冠名的大红门杯第58届世界小姐北京大赛成功举办。

经过多年发展，大红门地区从经营低档服装、小商品的“浙江村”逐步成为享誉京城乃至全国的服装特色商业区。到2014年，大红门地区共有45家市场，是北京市同类市场中业态最集中、体量最大的服装市场。直接从业人员约8万人，年交易规模约500亿元，税收2.6亿元左右。商业区内集中了众多销售企业，聚集了大批以提供服装面料为主的服装生产、加工企业，从面料供应、成衣加工至批发零售各个环节一应俱全，形成了产、供、销相对完整的服装产业链条。服装特色产业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聚集效应，促进了区域的繁荣和发展。

2. 疏解整治促提升与大红门商户京外“二次创业”

大红门地区服装产业的聚集与扩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社会繁荣，但产业定位及人员的大量聚集也导致这一地区“大城市病”凸显。大红门地区的服装批发业态与首都功能格格不入，产业形态以服务京外为主。据抽样调查，所经营商品30%来自浙江，20%来自广东，其余来自福建江苏等地。40%销往河北、30%销往东北地区，其余销往内蒙、天津等地。80%以上商户以服装批发为主，交易总量约占北京地区服装交易总量的70%，市场总体批零比例约为7:3。每天平均2000多吨的吞吐量，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交通拥挤，也存在大量消防、治安和管理问题。随着北京“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的明确，大红门地区的疏解整治促提升成为历史的必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北京“四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南苑一大红门地区是党中央和北京市高度关注的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地区之一，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标志性主战场。抓好南苑一大红门地区市场疏解，高标准谋划“南中轴”建设，在全市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具有标志性作用，对首都未来城市发展至关重要。

丰台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按照北京市要把南中轴

建成生态轴、文化轴、发展轴的要求，坚持规划引领，把疏解整治促提升作为解决丰台发展问题的金钥匙。自2014年8月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以来，坚持把南苑一大红门地区45家商市场的疏解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有计划、按步骤地扎实推进。尤其是2018年，丰台区成立了党政主要领导直接负责、常委和副区长一线办公的指挥调度体系，对南苑一大红门地区持续深化市场疏解，加强动态管控，开展综合治理。全区成立了大红门市场疏解专项指挥部，从各委办局抽调精干力量统筹推进大红门地区市场疏解工作。成立大红门地区疏解办公室临时支部委员会，发挥党组织在疏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不同经济组织的行业特点和诉求差异，采取“属地”和“属业”相结合的方式，成立地区行业组织党委，建立了大红门地区商业市场非公经济组织联合会。按照“党建引领、区域联动、共建共享”的工作思路，搭建起区域疏解党建平台。

疏解涉及的利益关系复杂，需要动真格、见真章，疏解办提出“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由党员干部带头组成6个工作小组入驻市场，深入一线督促协调市场加快疏解。地区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南苑村的一位党员干部带头拆除了自家占地10多亩的出租大院，党员商户带头自拆、劝拆、帮拆，促成了近500平方米违建拆除。向党员商户发放《请共产党员走在前列》的倡议书，号召党员商户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有的党员商户“一带十”，说服十多名老乡外迁，有的党员商户率先签约并主动做其他商户工作，加快了疏解进程。

大红门市场商户大多来自外地，动员

他们疏解，面临着“抓不住人、使不上劲”的难题。在疏解伊始，针对商户的观望与不理解，大红门街道组织辖区16个市场的法人代表，先后7次召开工作专题会，做好对商户的解释工作，为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营造良好氛围。通过地区行业组织党委，建立6个非公经济组织联合会，发挥商会的老乡优势，与商户搭建“连心桥”，主动沟通交流。利用永嘉商会党总支、乐清流动党员第一工委等商户党组织的影响力，吸纳地区40余家企业成立“非公企业党建沙龙”，定期举办主题活动，服务商户，促进疏解。

早在疏解工作初期，丰台区就成立了南苑一大红门地区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总指挥部和现场指挥部，加强统筹，集中精力，突出做好与外埠承接地和与外迁商户的“两个对接”工作。丰台区先后与保定市白沟镇、石家庄市长安区、廊坊市永清县、沧州市、天津市西青区等建立对接机制，牵头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疏解接待中心，主动为商户和承接市场牵线搭桥，提供政策咨询、资源对接等各项服务，将有温度的政府服务贯穿大红门地区疏解工作始终。

在工作过程中，疏解一线的干部们始终带着感情做商户工作，着眼商户需求，做到合理诉求必有回应，群众困难必有帮扶，从最初的吃“闭门羹”到商户主动招呼“进来喝茶”，实现了疏解工作的心平、气顺、人和、业兴。他们坚持“扶上马送一程”，主动帮助商户谋划外迁发展，多次带商户们到永清、沧州、石家庄、白沟实地考察，分析各地特点和优势，帮商户们选一个“好婆家”。主动对接承接地，协调办理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问题，解

决商户的后顾之忧。

企业和商户外迁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一环。在服务大红门地区商户和引导产业链整体外迁工作中，丰台区自觉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主动作为，找准合作契合点，与外埠承接地建立紧密联系，积极搭平台、促对接、谋发展，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格局。

2018年11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大红门”搬迁：引过来留得住过得好》为题，报道了丰台区大红门地区商户在河北省沧州市安居乐业并带动当地产业发展的“疏解故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这是大红门地区外迁商户京外“二次创业”的一个缩影。

随着疏解工作的深入开展，截至2018年年底，南苑一大红门地区外迁转移商户和企业越来越多，其中有8000多家服装批发商户、3200多家服装加工企业选择扎根河北沧州，在京外开启“二次创业”。在让这些外迁商户和企业走得安心、走得愉快的同时，为确保他们在京外落得下、留得住、过得好，2018年12月24日，丰台区联合沧州市共同成立了北京丰台—沧州（大红门市场）服务中心并正式挂牌。依托服务中心，丰台与沧州联合建立了定期会商机制，双方区领导每半年至少互访一次，会商区域合作重大事项，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容，双方协同办每季度至少沟通交流一次，深入研究合作事项，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周例会、月例会制度，推动各项合作的开展；建立了对接交流机制，搭建丰台—沧州协同发展平台，定期开展学习考察、会谈会商等活动，加深两地政府之间的合作沟通，推动投资、管理、

产业对接等多方面全方位合作，搭建大红门—明珠商贸城沟通对接平台，组织推介会、承接会，畅通商户外迁渠道，推动大红门地区服装批发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建立了服务保障机制，深入了解商户需求，及时上报工作过程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主动解决商户关心的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问题，解决商户后顾之忧，设立商户热线，有效化解纠纷。沧州市也专门为大红门外迁商户配套了可以成本价购买的20万平方米的住房，同时规定商户子女入学一律享受和本地学生同等待遇。沧州明珠商贸城也推出了“商户入驻，两年免租，商铺可买可租，并优先享有20年租赁权”的优惠政策；商城每天还派出20多辆大巴车，免费接送来自全国各地批发采购服装的客商。通过这些扎实有效的工作，南苑一大红门地区服装产业链从面辅料到加工制造，批发零售，再到包装物流等全要素集聚沧州，到2019年1月底，南苑一大红门地区外迁转移至沧州的商户和企业达1.65万家，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

2019年，丰台区继续有序、有力、有温度地做好南苑一大红门地区剩余市场疏解、商户承接工作。北京丰台—沧州（大红门市场）服务中心突出完善顶层设计、做好商户服务、加大政策支持、推动产业链转移等多项工作。一方面，建立商户管理台账，针对商户不同的需求及时作出应对。另一方面，分类开展商户服务。对已经外迁的商户，持续跟踪，定期调研，解决商户后顾之忧，有效防止商户回流；对正在等待外迁沧州的1.3万个商户，尽快安排企业为商户提供摊位、住宿，办理商户外迁手续；对大红门地区其他商户，加

大宣传力度，不定期组织商户去沧州考察，推动商户外迁。

为鼓励外迁商户开展自治，提高自治能力，2019年1月18日北京丰台（大红门市场）沧州服务中心联合东塑明珠商贸城正式成立明珠商贸城党总支，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增强外迁商户凝聚力和战斗力，助力商户开展“二次创业”，推动大红门品牌价值与影响力实现京外拓展，带动非首都功能疏解深入推进，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3.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

南苑，地处南中轴延长线两侧，自古就是一片湿地，河湖交错、水草丰美。自辽代起，便成为五朝皇家苑囿所在地。每到秋季，金风来时，南苑秋水长天、鹿雉出没、晴天碧树，风光别有情趣。明朝，“南圃秋风”被列入“燕京十景”之一。清朝更是将南苑列为“清帝园居”的第一个大型皇家苑囿，为北京近郊三大苑囿之中最大的一处。虽然南苑的大部分在今大兴区范围内，丰台区只占西北部，但南苑的正门大红门和大泡子、新衙门行宫都在丰台区境内。因此打造南苑皇家苑囿景观，再现昔日南圃秋风的美景，丰台区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地利优势。

早在2010年9月，大兴区就在瀛海镇一带建成南海子公园，再现了昔日皇家园囿风景，再造了麋鹿园并竖立“南苑秋风”碑石。随后，大兴区通过论坛、书画交流、举办讲座等多种方式一直在打造“南海子”文化。相比而言，丰台区在南苑文化宣传方面迫切需要加大力度。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明确中轴线及其延长线以文化功能为主，既要延续历史文脉，展示传统文化精髓，又要做好有机更新，体现现代文明魅力。南中轴作为中轴线及其延长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建设成为生态轴、文化轴、发展轴。使之成为融国际交往、科技文化、商务金融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元化城市综合区，成为带动南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

“南中轴地区”指北起南二环、南至南五环、西起京开高速、东至成寿寺路凉水河一线，是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³中的“一轴”，共包含东城区的永外，丰台区的大红门、南苑三个地区。南苑—大红门地区总面积约23.2平方公里，涉及南中轴长度约6.1公里。其中，三、四环之间大红门地区，面积约7.6平方公里，涉及南中轴长度约3.1公里；四环路以南至南苑机场为规划中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地区，面积约15.6平方公里，涉及南中轴长度约3.0公里。

南中轴丰台段贯通丰台区南北，是丰台区最宝贵的发展资源。为把这一地区建设成为“生态轴、文化轴、发展轴”，构建北城南苑、礼序乐和、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空间布局，2018年2月，丰台区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了南中轴地区概念性规划研究及永外地区—大红门地区—南苑森林

³ “一核”指的是由东城、西城区组成的首都功能核心区；“一主”指的是中心城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六区；“一副”指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北京新两翼中的一翼；“两轴”指中轴线及其延长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多点”是位于平原地区的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5个新城；“一区”是生态涵养区，包括门头沟、平谷、怀柔、密云、延庆5个区，以及昌平和房山的山区，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

湿地公园地区详细规划设计国际方案征集，共收到全球 31 家国内外优秀设计团队提交的申请文件，最终选取了 5 家综合设计实力雄厚、专业设置全面、既往业绩突出的优秀设计团队参与本次国际方案征集工作。规划主要体现在物理空间上，总面积达 26 平方公里，其中东城区永外地区 2.8 平方公里，丰台区大部分地区 7.6 平方公里，南苑森林湿地公园 15.6 平方公里。征集方案主要从空间上、功能上对区域进行提升和优化，体现以人文为中心的规划理念，其中南中轴地区规划以文化、科技、高端商务为主，建设生态轴、文化轴、发展轴，体现出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延续北京南中轴文化精髓，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古今交融、城绿交织的湿地森林的要求。7 月上旬，5 家设计团队提交了设计成果。7 月 19 日，丰台区会同市规划国土委及东城区对 5 家设计成果进行了技术评审和公开展示，并对这 5 家方案的优点和亮点进行汇总，形成综合方案。于 2018 年年底编制完成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导则和湿地公园设计方案，同时结合总规落实工作和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绘制地区规划建设发展的蓝图。

按照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丰台决定在南四环以南，南五环以北的区域内，高标准规划建设占地 1.6 万亩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该公园的面积将比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大近 4000 亩，约是南海子湿地公园一期的 5 倍。公园预计总投资达 85 亿元，按照完善首都生态格局“四梁八柱”，打造城市发展的绿色引擎的目标，构筑大尺度生态空间，以森林、湿地为本底，范围北

至南四环路，南至南苑机场北侧，西到京开高速，东到丰台与大兴交界处，规划绿地及水域面积 13665 亩，其中 70% 的土地为绿地，核心区约为 1.5 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大小，水域面积所占比例也高于奥森，将重构森林体系、恢复自然湖泊水系、贯通水网绿脉，再现南苑湿地水网和“南囿秋风”历史景观，体现生态修复特色，为市民提供亲绿、亲水的休闲场所。在公园北部，是占地 700 亩、日处理能力 60 万吨的槐房再生水厂，完全满足整个湿地水源补给要求。

在高标准制订规划的同时，丰台区先行启动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拆迁、腾退、绿化等前期工作。规划前已有绿地 7000 亩，2017 年、2018 年通过平原造林、留白增绿等方式，又新增绿化 2700 亩。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已拆除地上物 113.2 万平方米，腾退土地 2500 亩，累计实现绿化 9700 亩，南苑万亩森林湿地公园初具雏形。

大泡子是南苑园林中的一部分，明代就有此名称，该地又称苇塘泡子，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湖泊。它是南苑最大的一块水域，水域面积最大时，有近 1 平方公里。1949 年后，这里逐渐发展成居住区，原有的面积日益缩小，90 年代时还有 0.5 平方公里，2000 年后逐渐干涸，杂乱地建了许多平房，还有农机仓库等，环境遭到很大破坏。为恢复这一地区的生态，丰台区大力开展整治工作。2019 年 6 月 11 日，随着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规划范围内重点区域——南苑大泡子的最后一处建筑物自行拆除，近 600 亩的大泡子区域内，既有建筑物已拆除完毕。下一步将根据规划进行施工建设，未来这个区域将成为南苑森林湿地公

园里一颗璀璨的明珠。

2019年，市政府批复的《丰台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035年）》提出：“高水平建设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贯彻以人为本、生态为底、文化为魂、功能为基的理念，再现南苑历史印记、延续历史文脉、营造森林湿地风貌、构筑完整生态系统，构建顺畅游览环线，打造多元活力空间，建设成为首都南部结构性生态绿肺、享誉世界的千年历史名苑。”根据规划，丰台区进一步深化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建设方案，划定5025亩区域为公园一期工程，启动并有序推进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建设，以新机场高速以东、南苑路以西、通久路以南、南苑西路以北的区域为启动区，将充分利用已有的绿色空间，打通区域生态廊道，建设多级多类公园，恢复历史湖泊水系，开展水系岸线生态化建设。

未来，随着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建成，将大尺度构建城南的绿色空间，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发展要求，打通一道绿隔，建设城市公园环，进一步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南囿秋风”的历史景观也将再现世人面前，成为南中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4. 首都商务新区宏伟蓝图

北京南部地区是“一核两翼”（“一核”是指包括首都功能核心区在内的北京中心城区，“两翼”是指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的腹地，是首都面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长期以来，北京南部地区发展一直落后，南北部地区发展不均衡，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选

址北部以后，使北京南北部地区发展的差距相对较大。

为切实解决首都南北发展不平衡、南部地区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北京市先后于2010年至2012年、2013年至2015年相继实施了两个阶段的南部地区发展行动计划（《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2010—2012年）》《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2013—2015年）》）。这两轮行动计划，重点推动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等方面项目建设。共安排重大项目395项、总投资约6860亿元，南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9.6%，高出全市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通过实施前两个阶段南部地区行动计划，南部地区发展短板得到有效改善，城市功能进一步优化提升。

丰台区作为北京南部地区腹地，北接东西城，东跨中轴线，区位优势非常优越。毗邻京津、京保石两个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具有交通便利和产业协同发展的优势。因此，丰台区是前两个阶段南部地区行动计划的重点区，也是受益较多的区。期间，共实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领域重点项目168项，实现投资2657亿元。其中，通车轨道交通线路由实施前的2条增加到9条，通车里程由20公里增加到90公里，快速路、主干路新增建设里程76公里，区域内次干、支路总里程增加了600公里；新增园林绿地638公顷，综合整治马草河等16条河道，增加河西再生水厂、青龙湖再生水厂等污水处理厂4座，污水处理能力增加了近一倍，有力地提升了丰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了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丰台区在北京两轮南部地区行动计划的推动下，日渐摆脱昔日城郊印象，走上快速发展轨道。

2017年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标志着新版总规已经成为北京未来城市发展的法定蓝图。《规划》中提出的构建“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为北京南部地区的建设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丰台区既是中心城区，也是首都南部地区发展的重要节点。地理位置上的不可复制性，为丰台区的发展再次提供重大历史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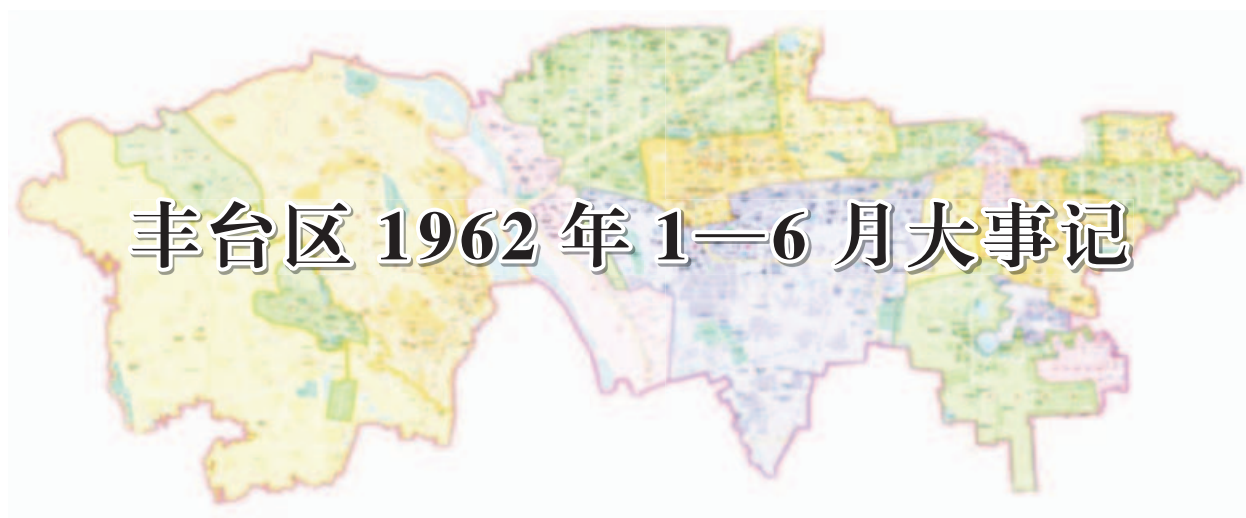
依据新版北京城市总规，北京南部地区的基本骨架被设计为“一轴、两廊、两带、多点”，其中“一轴”即南中轴生态文化发展轴；“两廊”即京津发展走廊、京雄发展走廊；“两带”即南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南段）；“多点”即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良乡高教园以及房山、大兴、亦庄新城地区，每个区域和节点有其不同的定位。从其基本功能架构的设计来看，南部地区部分区域着重疏解，部分区域着重承载。丰台区作为首都中心城区，是首都“四个中心”功能主承载区之一，将扮演“首都高品质生活服务供给的重要保障区，首都商务新区，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的融合发展区，高水平对外综合交通枢纽，历史文化和绿色生态引领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区”等重要城市角色。因此，丰台区承载了生活、商务、科创、金融、文化、绿色等多重功能，其中商务发展可以说是丰台最突出的功能。

根据新总规，在南三环以南、南四环

以北、马家堡东路以东、光彩路以西、南中轴两侧7.6平方公里范围内，将规划建设首都商务新区，空间载体以高端商务、文化、科技创新为主。首都商务新区以南苑、大红门地区转型发展为带动，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在首都商务新区设立首个“商品交易市场规范提升指导中心”和“首都商务新区商标品牌指导站”，以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为抓手，全面推进大红门服装商贸产业向品牌时尚产业转型，推动区域经济提质升级。

2018年9月19日，北京市发布第三阶段南部地区发展行动计划（《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通过实施行动计划，使城市南部地区逐步实现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环境质量和公共服务等短板进一步填平补齐，交通基础设施和生态品质进一步提升，重点功能区和产业进一步实现高端发展，努力建设成为首都发展的新高地。到2020年把南部地区打造成首都功能梯度转移的承接区、高质量发展的试验区、和谐宜居的示范区。

丰台区是第三阶段南部地区行动计划唯一的中心城区。依托此次南部地区行动计划，丰台区将重点打造“一轴”，即南中轴，抓住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以“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为带动，高标准谋划建设生态文化发展轴，积极推进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建设，做好大国首都中轴线的文章，植入文化等高端要素及重大活动，高质量做好城市设计，珍惜用好每一块土地，全力打造首都商务新区。随着疏整促
(下转第64页)



丰台区 1962 年 1—6 月大事记

1 月 2 日 — 16 日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北京市出席中共八大的代表朱蕴山、荣科、陈先舟、梁军、李烛尘、楚溪春、鲁崇义、陈建晨、安翰华等人，先后到丰台区的模式口、卢沟桥、南苑、三路居、白盆窑、小屯、八宝山等地视察工作。

1 月 6 日 中共丰台区委在《关于改进分配办法 克服队与队之间平均主义的报告》中指出：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以后，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对“三包一奖”办法，作了改进和提高。仍然有许多社员和干部对“三包”办法不清楚，以产定分和开支比例悬殊，因而超产队吃亏，赔产队占便宜，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的干部、社员不摸底。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区委经过试点提出：凡是“三包一奖”问题较多的队，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简化手续，克服生产队的依赖性。生产队的土地、耕畜、农具原则上不动，非动不可的，必须事先经社员群众充分协商。

1 月 16 日 中共丰台区委常委会议原

则同意区商业局党组《关于恢复农村供销社的意见》。《意见》认为，1959 年供销社经济性质由集体改为全民，区供销社改称商业局。为了使农村商业同农业生产的集体所有制相适应，便于公社党委加强对商业的领导，便于接受社员的监督，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应在全区农村恢复供销合作社。

1 月 20 日 中共丰台区委批转共青团区委《关于结合整风整社整顿团组织的意见》，决定对团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全体团员的觉悟，健全民主生活制度，进一步广泛地联系群众，当好党的助手。

1 月 23 日 — 25 日 中共丰台区委组织 70 多人，组成 13 个访问组，分别访问了王佐、长辛店、石景山 3 个公社的 13 个大队的农民，听取意见。社员群众对口粮决算分配、平调的退赔、生活资料供应等方面，反映了一些具体意见。

1 月 30 日 中共丰台区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区委处理右派领导小组《关于对

右派分子组织学习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几年来对右派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争取、教育、改造工作。1959年和1960年给确已悔改的121名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并对其中的110名重新分配了工作；对按二类处理，摘帽子后的工资也相应作了调整；这次又给78名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2月10日 根据上级指示，丰台区成立民兵工作委员会，由15人组成，主任王景铭，副主任毕启明、谷爱民、刘义。其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军委有关民兵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审查民兵建设计划，提高全党、全民在和平建设时期的警惕性，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

4月3日 中共丰台区委常委会议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丰台区办事处党组《关于农村金融机构设置意见的报告》，提出在农村恢复信用合作社。全区在1956年共有信用社73个，这年合乡并社后，信用社也并为24个。1958年公社化时，又改为21个信用部，仅设干部1人，而且代理生产大队出纳。1961年人民公社调整基本核算单位后，又按生产大队为单位设立56个信用分部。每分部仍设干部1人，代理大队出纳，严重影响信用业务的开展。为了便于民主管理和支持农业生产，将现有信用分部恢复为信用社。信用社是农村劳动人民在自愿互利基础上建立的资金互助组织，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信用合作社的一切财产，属于社员集体所有。

4月10日 中共丰台区委制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意见》。指出：针对党内的组织生活、民主生活不够经常，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缺乏制度。不少新党

员觉悟不高，违反国家政策。有的党员干部之间闹无原则纠纷，组织涣散无力等状况，区委决定采取4项措施加强党的建设工作：一、大力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训练。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轮训党员，加强党课教育和党员正常的学习制度。二、健全党的组织生活，整顿党的组织。加强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活跃民主生活，改进工作方法。三、适当地控制接收新党员。四、加强对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领导。

4月24日 中共丰台区委部署选举出席中共北京市第三届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5月5日，分片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王景铭、申耀池、刘广辉等43人当选为正式代表。高瑞林、陈舜英、杨永洋、侯秀英4人当选为候补代表。

5月27日—28日 中共丰台区委召开常委会议，同意区商业局党组《关于国营企业与供销合作社业务分工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从地区上划分，凡是集镇和纯居民区的商业，划归国营企业经营；凡是农村的商业划归供销社经营。从业务划分，凡属集镇和居民区的生活资料供应，由国营企业负责。农村的生活、生产资料供应、农副产品收购，由供销社负责。

▲中共丰台区委召开常委会议，同意区长石九言所作的《关于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丰台区国营财贸系统共吸收商贩1401人，其中1957年以前吸收87人，1958年以后吸收1314人。根据中央和市委关于“1958年以后进入国营的小商贩，除了少数政治骨干，有技术专长，我们又迫切需要的，

大部分都退回去搞合作商店、合作小组。1957 年以前进入国营的，自愿要求出去的，也可以退出一部分”的指示。全区 1958 年以后进入国营的小商贩准备退出 1086 人，计划组织合作商店 83 个，合作小组 11 个。

6 月 20 日 中共丰台区常委会议，同意丰台区修理事业管理局成立党组。

6 月 26 日 中共丰台区常委会议，讨论区人委卫生科《关于调整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丰台区于 1951 年开始建立联合诊所，到 1956 年全区大部分个体开业医师均已组织起来。1958 年公社化时，联合诊所均成为公社、大队所属的卫生所。目前全区共有

集体所有制的卫生所 27 个。共有医务人员 363 人(医师 149 人)。其中卫生所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 14 个。大队统一核算的 10 个，公社统一核算的 3 个。为了进一步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应以卫生所为单位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成为医务人员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在公社和医务人员双方完全自愿的原则下，也可以成为由公社主办的卫生医疗单位。区委意见：先把单独核算的 14 个卫生所总结一下，再搞试点。

(摘自：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丰台区历史大事记 1918—200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 5 月第 1 版)

(上接第 61 页)

任务的完成，一批批发零售企业将升级改造，旧的业态面临华丽转身，一批国家级的文化中心等首都功能将逐步在南部地区落地。

随着高端商务服务、时尚创意、展示交易、电子商务等特色产业发展，首都商务新区将建设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示范、环境优雅、宜居宜业的面向国际交往的重要门户。2019 年 11 月 27 日，《丰台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获市政府批复。批复指出：“南中轴丰台段是首都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带动城市南部地区崛起的生态文化发展轴，是未来拓展首都功能的重点地区。”分区规划对南中轴地区总体定位为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彰显区、大国首都功能的新兴承载区、北京南城崛起的核心引领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样板区、和谐宜居城

市建设的示范区。构建以文化和国际交往功能为主导，以国际商务、生活服务和生态游憩等功能为支撑的五大功能体系，延续历史文脉，凸显新时代首都文化特色。根据分区规划的要求，大红门地区将结合用地疏解更新，加快推动地区业态转型升级，优先承接文化交流、艺术博览等文化中心功能，彰显中华文化自信。重点植入国际文化组织、国际总部办公等高端商务功能，建设成为带动城市南部地区发展的首都商务新区和城市更新发展示范区。作为全北京乃至全国唯一一处以“首都”命名的商务新区，首都商务新区无疑将成为平衡北京南北发展的均衡器。

(原载：丰台史话编纂委员会编《丰台史话》，中华书局，202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本刊转载略去原插图，部分文字有改动。)